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專輯前言

李明輝\*

在經歷帕金森氏症的多年折磨之後，劉述先先生於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凌晨在睡夢中溘然病逝於其臺北寓所。當天下午我得知此一噩耗後，便立刻通知當時正在廣東從事學術活動的同事林月惠女士。透過她的轉達，大陸學界立刻得知此一噩耗，並且有熱烈的回響。大陸重要的網路媒體都大幅報導了此一不幸的消息。我也不斷從電子郵件收到大陸學者的唁函及追悼文字。反之，臺灣的媒體對此事表現得異常冷漠，只有《聯合報》刊登了一則不大不小的報導。但是，劉先生在香港與臺灣的故舊門生紛紛傳來唁函及追悼文字。本所網頁立刻刊載來自各地的唁函及追悼文字。

六月二十日，劉先生公祭之後，遺體隨即火化，骨灰安葬於臺北市富德公墓。《鵝湖月刊》於同年六月及七月號分兩期刊出「劉述先先生悼念文集」，總共有六十二篇文章。由於本所與劉先生的特殊關係，本所特別邀約兩岸三地與劉先生有密切關係的故舊門生撰寫追悼文章，共得二十篇。其中除少數文章已在他處刊登過之外，大部分文章都是首次刊登。我們希望能以此專輯表達我們對劉先生的敬意與追悼。

---

\*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 劉述先先生行狀

劉述先先生本名衍言，學名述先，祖籍江西省吉安縣，一九三四年生於上海。父靜窗公，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思想出入儒佛，後歸宗華嚴；母王氏蘊聰，生於鄉紳之家。先生幼承庭訓，加上稟性聰穎，學業常名列前茅。抗日勝利後，在上海先是就讀振英模範小學，後轉入位育小學，升位育中學。一九四九年大陸政局丕變，先生以十五之沖齡承父命與堂兄冠先離鄉背井，負笈臺灣。

先生抵臺後，先入成功中學，兩年高中畢業後，考取臺灣大學哲學系。由於家庭教育背景緣故，先生自始即與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思潮不契，年輕時已發願要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求溝通之橋樑。因此，先生在大學時專攻西方哲學，受方東美、陳康二師之影響最深，亦從父執牟宗三先生遊。一九五六年先生就讀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討論卡西勒的文化哲學，並在《人生》、《民主評論》發表文章，筆名言衍。其時所撰文字後結集為《文學欣賞的靈魂》與《語意學與真理》兩書。

先生取得碩士學位後，得牟宗三、徐復觀兩先生之推薦，到東海大學任教，負責通才教育人文學科方面的課程，時王靖獻（楊牧）、杜維明等先生皆在學生之列。在教學之外，先生致力於文化哲學的探索，並發表系列論文，後結集成《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與《文化哲學的試探》二書。先生在東海大學任教六年，自講師升至副教授。其間與劉安雲女士緣訂終生，婚後育有兩子豁夫與杰夫。

一九六四年先生得海里士教授之引介，赴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攻讀博士，師從著名哲學家、神學家魏曼教授，撰寫有關田立克的詮釋與批判之博士論文，兩年即取得學位，並留校任教。先生在南伊大任職十五年（中有五年在香港），自助理教授升遷至教授，除教授東方哲學的課程以外，還教授哲學概論、西方哲學史與文化哲學。一九七一年先生藉休假之機，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一年。其後，先生分別於一九七四至七六年，以及一九七八至八〇年兩度應邀至中文大學哲學系主持系務。一九八一年先生正式辭去南伊利諾大學教職，出任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直至一九九九年退休為止。

先生在中文大學哲學系任教共二十三年，一直兼持系主任之職，至一九九三年始卸任，又曾擔任人文學科研究所的創所所長。在這段期間，先生全心投入教研

與系務工作，對哲學系、文學院、新亞書院及大學均貢獻良多。在教學方面，先生深受學生愛戴，桃李滿門，任教於香港各大學。在研究方面，先生對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做深入研究，出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及《黃宗羲心學的定位》。其後更以英文著述 *Understanding Confucian Philosophy: Classical and Sung-Ming* (1998) 向英語學術界介紹宋明儒學。一九九三年以來，先生積極思考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的課題，回應德國神學家孔漢思提出的〈全球倫理宣言〉，響應美國神學家史威德勒「對話或死亡」的呼籲，有關文章後結集成《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一書。先生居港期間，並不自限於學術象牙塔之內，而是一本傳統知識分子的承當精神，對時局亂象多所針砭，對社會文化問題積極建言，經常撰文發表於香港報刊。

一九九一年，中央研究院設立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先生從籌備之初便擔任其諮詢委員。一九九二年戴璉璋先生接任文哲所籌備處主任後，邀請先生共同推動「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此一計畫進行了十八年，使文哲所成為當代儒學研究的重鎮。先生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定居臺北，在文哲所擔任特聘研究員，繼續推動儒學研究。直到二〇〇四年先生年屆七十歲時，才再度從文哲所退休，改任兼任研究員。在這段期間，先生以英文出版 *Essentials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2003) 一書，向英語學術界全面介紹當代新儒家的思想。先生退休之後，依然每天到文哲所為他保留的研究室工作，並且在東吳大學哲學系及政治大學哲學系兼課。其間，先生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先是一眼因手術失敗而失明，繼而經醫院檢查證實得到帕金森氏症，行動能力急遽下降。但先生依然持續其研究與教學工作，直至今年六月六日清晨在睡夢中辭世，誠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先生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著作等身，望重學林，多年來致力於重建儒學，被譽為當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為新儒家開拓了一個更為多元開放的全球面向。先生生前，以其雙親之名在大陸設置「劉靜窗青年教師獎」及「王蘊聰紀念獎學金」，以其祖父之名在臺灣設置「紀念劉理堂先生博士論文獎」，在香港則設立「劉靜窗紀念獎學金」，嘉惠兩岸三地學子。今先生魂歸道山，學界又痛失一位學問泰斗！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懷念劉述先教授

戴璉璋\*

劉述先教授，是我所敬佩的朋友。在他那裏，我學到很多，也得到很多幫助。我與他兩度共事，起先是在新加坡，一九八六年，我們各自利用大學休假的時間，先後到獅城東亞哲學研究所做研究。不約而同地，兩人都對《周易》有深入探討的計畫，思索的重點不同，但仍有許多可以共同商量的地方，隨時討論，總是我獲益較多。一九八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成立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劉先生與我都是諮詢委員，共同為設所的事務投注心力。後來又一起推動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這個計畫，進行了十多年，主要工作都是劉先生與李明輝先生等合作使它落實，獲致豐碩成果，為文哲所哲學思想組奠定良好基礎。

據劉先生自述，他在一九五一年進入臺大讀書的時候，就決定了從事哲學探索的人生方向。六十多年來，堅守這方面的志業，從未間斷。他在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並且留在那裏教了十多年書。長期生活在西方社會中，受到西方哲學洗禮，卻一直念念不忘中國哲學發展的前景，深入探索儒學的現代意義。從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來，他具有國際視野，明察時代趨勢，秉持哲學專業、批判精神所開發出來的古典新義，自有獨特睿識。回到東方後，劉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主持哲學系。用心於系務、校務興革之餘，在講學與研究方面也成效卓著。一九九九年他在香港中大退休，定居臺北，並未停下腳步，仍舊繼續他的哲學志業。除了在文哲所做研究外，還在東吳、政大哲學系所開課。近幾年對於培育人才、獎掖後進特別關心。為武漢大學國際儒學研究中心設立博士生獎學金及青年教師獎，來紀念他父母。又在中研院文哲所設立博士論文獎，來紀念他祖父。這些作為，自然也讓人感動、欽佩。

---

\* 戴璉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在生活上，劉先生興趣廣泛，是多才多藝的人。早年讀了很多文學作品，寫出《文學欣賞的靈魂》，成為暢銷書，引起注目。他是橋牌高手，在新加坡曾有輝煌戰績。他也喜歡看電影，看球賽。這些愛好，也反映出他為人豁達灑脫的一面。他豁達地面對衰老、病痛；灑脫地用長睡的方式終結看似平凡，其實不平凡的旅程。他很欣賞張橫渠〈西銘〉最後的兩句話：「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活著，就循天理，做該做的事；去世，可依天命，安詳離開。劉先生用自己的生命為橫渠這兩句話作了見證，也為當世君子立下典範。

（本文原刊載於《鵝湖》第 493 期〔2016 年 7 月〕，承蒙鵝湖月刊社授權轉載，特此謹申謝忱。）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為生命樹立一個目標 ——紀念劉述先教授

馮達文\*

去年九月應邀赴文哲所開學術研討會，還有幸聆聽劉述先教授睿智的學術評點。未曾想到，幾個月後，教授與世長辭，學界又失去了一位仁人長者，令人太息！

我最初認識劉教授，可以上溯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九八四年，劉教授赴杭州參加有關中國哲學的學術會議，會後應邀前來中山大學哲學系講學。那時我入行不久，聽到劉教授以全新的解釋框架講授中國傳統的智慧，很受啟迪。隨後，劉教授與我系協議，我系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每年互派一位教師做交流與訪學。我於一九八九年四月間得以赴港，在擔任系主任的劉教授的主持下，與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師生做第一次學術交流，再次有機會聽到劉教授的評點，這對我個人學術眼界的拓寬，無疑更提供了助力。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劉教授榮休後回到臺灣，接觸機會少了。但仍然不時讀到他的大作。教授「誓以一生之力，省察各種不同的哲學思想，為生命樹立一個目標，為文化覓取前途」<sup>1</sup>的宏願，在參與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的過程中，面對不同思想信仰的挑戰，為維護儒家的價值觀，而對儒家思想做開放性的種種詮釋，都在學界產生重要影響。這當中，教授通過新釋「理一分殊」、「兩行之理」等論題，使傳統文化為現代社會的道德重建，和現代人的安身立命提供指引的許多論作，尤使我個人深受教益。

劉教授對程朱所主的「理一分殊」論題的新釋，是參與聯合國於一九九七年成

---

\* 馮達文，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sup>1</sup> 劉述先：《中西哲學論文集·自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頁IV。

立的「普遍倫理計畫」的研討中做出的。教授於〈「理一分殊」與道德重建〉一文中充分闡明了程朱「理一分殊」說在當代社會倫理重構所可能發揮的建設性作用。教授深知，在倫理領域中，古今中外異俗，彼此之間不只有差異，甚至有矛盾。但用「理一分殊」的論說做出審視，卻一方面可以容許表面層面的種種差異與矛盾，而另一方面又不會妨礙到精神層面上的契合與感通。就內容而言，教授認為，儒家的「仁愛人道」原則，我們可以理解為它只是一個「規約原則」，不一定能夠直接下貫到各別的變動不居的人群中。但劉教授指出：「表現層面上的變易無常必須與時推移，並不能否定規約原則的正確性有其萬古常新的含義。……就分殊層面來說，古今中外異俗，父子、夫婦之愛內容上決不可能完全一致，但這些表現指向——超越的『愛之理』——這即是朱子對『仁』的定義的一部分，精神上的感通決不是時空文化的差異所可以隔絕的。我們在當前，既要隨著時空文化的變化而與時推移，卻又要在同時體證『理一』，讓它作為規約原則，在我們的生命裏發揮作用，『兩行』兼顧，這才可能幫助我們克服當前的困難，也就是我們重建道德倫理必須走上的方向。」<sup>2</sup>於此，教授通過對「理一分殊」論題的新釋，就使古典儒學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接納與融和世界不同的宗教與倫理精神。儒學因而也從上一代人的「守護」的立場，轉換為「對話」的立場。

劉教授通過對「理一分殊」論題的新釋，為當代倫理重建提供了指引；又藉著對莊子「兩行之理」論題的新釋，弘發中國古典道、釋、儒三家如何可以為當代人的「安身立命」提供意義。為此，他專門撰寫了〈「兩行之理」與安身立命〉長篇。

劉教授的關切點，無疑集中在中國古典思想是否既有超越的一面、又有內在的一面的問題上。教授指出，「兩行之理」的命題首先是莊子提出來的，「如果把超越當作一行，內在當作一行，兩方面的和合當作莊子最高境界的體證，就可以看到，莊子的確體現到很深的兩行之理的智慧。而這是通過創造的詮釋學給莊子思想的一個最好的系統闡釋」<sup>3</sup>。劉教授的這一新系統闡釋，無疑也極具啟發意義。只是，劉教授對莊子局限性的評點還稍嫌有失。莊子和老子通過「無」的本源一本體建構，

<sup>2</sup> 劉述先：〈「理一分殊」與道德重建〉，東方朔編：《儒家哲學研究——問題、方法及未來開展》（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83。

<sup>3</sup> 劉述先：〈「兩行之理」與安身立命〉，同前註，頁194。



把人的精神往上、往超越的層面提升之後，又是可以往下入世「與世俗處」的。特別是他們的隨順自然的主張，在黃老思潮那裏開展為依因大自然陰陽四時五行的變遷節律，安排生活與政治運作的一大理論系統。因為有著強烈的守護自然的色彩，而特具現代意義。

劉教授對佛家的觀念取「兩行之理」解釋，亦甚精當。他指出，佛教中觀論的「緣起性空」說，緣起即顧及內在，性空即突顯超越。他在文中寫到：「緣起而不起執著，則宛然而『有』，諸法既無自性，自當體即『空』。空有相融，乃即真空而妙有，無障無礙，為一味法。由兩行之理的角度來觀察，講性空是突顯其超越面，不以俗見的現實世界為真實，乃可以解脫於由這方面的執著所產生的繫縛與煩惱，而徹底斷除煩惱、所知二障。講緣起是照顧到內在面，『空』並不是在因緣相待所呈現的宛然而有的世界之外，另外孤懸一個建築在空體上的淨潔空闊的世界，或者根本否定了因緣相待宛然而有的現象世界的存在。這兩種看法乃重新墮入了常見與斷見的窠臼，而缺乏了對於佛家的體證的真正的解悟。由這個角度來看，龍樹的《中論》恰正是佛家的兩行之理的一個最為簡要的表達，龍樹是以遮詮的方式講『八不』以突顯出『二諦圓融』所蘊涵的兩行之理。」<sup>4</sup>如果說龍樹之中觀論是以遮詮的方式表顯「兩行之理」的，那麼隨著佛教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益增強而有所推進，則可以說是由「遮詮」而轉為「表詮」，由「雙非」語式所標示的更偏重於辯破的論說，而轉易為「當下即是」的心性體悟。劉教授指出：「禪宗肯定『當下即是』，已令超越深入內在，正如六祖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在佛家思想的義理規模之下，已不可能再往前更進一步了。」<sup>5</sup>劉教授於此也把佛家思想融匯到他對「兩行之理」的創新性的解釋中。他對禪宗的評說必深為教內外所認同。

但劉教授畢竟更心儀儒家。他寫道：「由儒家的觀點看來，佛家於人倫日用只能由俗諦的立場當作方便設施來接受，不能做出根源上的肯定，同時佛家的空理也終不能肯定天壤間生生不已之天理之存在與發用，而於性理、事理方面不免尚有所憾，則仍然是偏於超越，不夠內在。」<sup>6</sup>由是，劉教授回到儒家。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儒家是只講內在，不太有超越追求的。所以，劉教授在論

<sup>4</sup> 同前註，頁 196。

<sup>5</sup> 同前註，頁 204。

<sup>6</sup> 同前註。

及儒家時更著意於它的超越面。他認為，在孔子那裏，「天」就是孔子對超越的嚮往；在孟子那裏，「良知良能」的認定即體現著一種超越的精神。作為對基督教的超越追求的回應，劉教授特別指出：「只不過儒家把握超越的方式與基督教完全不同：基督教一定要把宗教的活動與俗世的活動分開，儒家卻認為俗世的活動就充滿了神聖性；基督教要仰仗對基督的信仰、通過他力才能夠得到救贖，儒家的聖人則只是以身教來形成一種啟發，令人通過自力就可以找到自我的實現。」<sup>7</sup> 教授的這一評點無疑是極其切適的，《中庸》主「贊天地之化育」以成德，《易·繫辭》稱「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之論說，都強調在經驗世間，通過人自己的努力付出，就可以體證超越性的天道，而無須出離世間另求超越。

劉教授深深意識到，光只顧及超越的追求，而不能下落到現實世間（內在），即是有體而無用，不免墮入空幻之中；光只顧及現實世間（內在）而缺失超越追求，那必為眼前的利害爭奪所困迫，而無法安身立命。只有既有超越的理想追求，又有現實的加倍努力，兩行兼顧，才是最合理的人生。教授稱道：超越與內在的兩行兼顧，使我有雙重的認同：「我既認同於超越的道，也認同於當下的我。我是有限的，道是無限的。道的創造結穴於我，而我的創造使我復歸於道的無窮，是在超越到內在、內在到超越的迴環之中，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sup>8</sup>

劉教授生前這一番「安身立命」的理論指引與生命體驗，誠然應當為我等學人所共許！

---

<sup>7</sup> 同前註，頁 212。

<sup>8</sup> 同前註，頁 227-228。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亂離時代中飄泊的靈魂 ——懷念劉述先教授

黃俊傑\*

—

驟聞劉先生突然往生，內心為之一震。過去這幾年，知道劉先生為帕金森病所苦，但每天仍走路來文哲所辦公室，深感不忍，也非常關心他的健康狀況，常打電話向他請安，言談間感覺劉先生起居尚安。所以，劉先生突然走了的消息傳來，友生之間莫不震撼。

六月二十日在市立殯儀館的告別式，我提早一小時就到會場，向劉師母請安之後，坐在冷氣開得很冷的廳堂中，想著數十年來在學習歷程中，受到劉先生的啟蒙、指導與關懷，思緒泉湧。

我第一次讀到劉先生的著作，是在民國五十五(1966)年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所讀的是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版的《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這本書。一個二十歲耽溺於史料蒐集的歷史系二年級學生，驟然接觸這本縱論現代哲學的書，不免「驚怖其河漢無極」。五十年時光容易過，這部書的重要論點皆已不復記憶，但是，書中有兩點，至今印象甚深。第一點，是劉先生在這本書的〈自序〉一開始就說：「十五年前，當我脫離溫暖的家庭，失落在廣大的世界中，我就有志尋思哲學問題……。」這段話使我印象深刻，對一位亂離時代中飄泊的心靈，有了一種同情的瞭解。當時我心想，人也許只有經歷時代的亂離與飄泊，經歷曠古的孤寂，才會深思生命的意義。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第一屆國際朱子學會議」上，我

---

\* 黃俊傑，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初謁劉先生，接談之際就向他提起一九六六年讀這篇〈自序〉留給我的印象。第二點，是在這本書中，劉先生說新時代的哲學必須符合三項標準：（一）在理論上自圓一致；（二）在經驗上得到實證；（三）更重要的是在人生上得到踐履。這三項標準也使我印象深刻。劉先生出版這本書的時候只有三十二歲，但就已經展現他讀書的博雅與深思。

## 二

劉先生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回到中研院文哲所擔任特聘研究員，與戴璉璋先生一起推動文哲所的「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之後，承蒙兩位前輩的好意，讓我參加這項研究計畫的工作，才有比較多的機會，向劉先生請益。劉先生是兼通中西的專業哲學家，但是，他對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並不排斥。我記得他在《黃宗羲心學的定位》書中，就曾經主張：要用思想史的觀點校正哲學的觀點，也要用哲學的觀點校正思想史的觀點。記得一九九一年文哲所舉辦「國際朱子學會議」，劉先生發表〈有關理學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再反思〉，主辦單位安排我擔任評論人。我寫了一篇長文，從思想史視野回應劉先生的大作，我的評論稿又長又缺乏重點，至今思之仍覺汗顏不已，但當時承蒙劉先生寬容我的不足與缺漏，實在慚愧。每一次我去文哲所，一定會去劉先生的研究室看他，向他請益，我非常感佩他對不同研究進路的後學的寬容與鼓勵。

## 三

最近二十年間，臺大所推動的「東亞儒學研究計畫」，幾乎每年都會邀請劉先生擔任研討會的主題演講，或指導同仁的研究。最近三年劉先生體力日衰，但是每一次的評鑑會議他都勉力參加，我一直感念在心。劉先生最近幾年來臺大參加研討會或評鑑會，幾乎每年都提醒我，要注意鼓勵、培育年輕學者投入儒學研究。他所念茲在茲的是，儒學在二十一世紀的弘揚與儒學作為學術領域的發展前景。我相信，劉先生將他個人的積蓄，在海峽兩岸的大學捐贈獎學金，也是本於鼓勵後進弘揚儒學的心意。

記得半世紀前，我第一次讀到熊十力先生《讀經示要》，〈自序〉中說他寫書

的起心動念，有「念罔極而哀淒，痛生人之迷亂」一語，頗受感動，對二十世紀當代新儒家學者的悲願，有了較為同情的瞭解。我相信，劉先生畢生所奮鬥的生命目標，正是建立在這種對時代的感懷與悲願之上。劉先生已離開我們，但是他所建立的典範，永遠召喚著我們！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懷念劉述先先生

郭齊勇\*

劉述先先生於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清晨駕鶴西去。驚悉噩耗，不勝震悼！劉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學者、著名哲學家與哲學史家，第三代現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海內外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他的新儒學思想自成體系，鴻博精深。他在中西哲學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意義深遠。劉先生不僅在中國大陸及臺、港、澳地區擁有很高的知名度，其論著在英語世界也同樣受到了西方學者的關注。劉先生晚年尤其關注全球倫理問題，代表中國文化與世界其他不同文化、宗教傳統開展對話。他一生著述宏富，思想見解獨到，時代感強，影響力大。他的逝世是海內外中國哲學界的重大損失！

劉先生走了。哲人其萎，這是十分悲痛的事情！作為後學晚輩，我一直得到劉先生的關愛。初識劉先生，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香港窩打老道八十四號冠華園的法住文化書院，霍韜晦先生主持的「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期間。這次會議促成了兩岸三地及海外不少同行學者的相識相知。當時，牟宗三先生與劉述先先生都到會了。業師蕭萐父先生此前在杭州宋明理學討論會及在美國召開的國際中國哲學會上，已與劉先生相識，蕭先生把我介紹給劉先生。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作為哲學系講座教授的劉先生是此次會議的主持者。王寬誠教育基金會請他出面在中環的上海總會宴請來自中國大陸的十一位學者。大會開幕式上，該校當時的副校長金耀基教授致歡迎詞，劉先生發表主題演講。會議結束時他又做總結報告。他從時代、方法、形上、踐履四個角度論述了當代儒學發展的新契機。他分析了當代新儒家三代學者的貢獻及發展，並指出：回應新時代的需要，學者視域的多樣，

---

\* 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與哲學學院教授。

儒學將獲得新的發展。他的報告啟我良多。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參加錢穆先生百齡紀念與學術討論會。會上余英時、許倬雲、劉述先與金耀基先生等人為主角，我藉此機緣拜會了錢先生的一些老弟子，也與汪學群先生在會上發表了論文。會後我在該校訪問一週，做了一場學術報告。劉先生曾在他的辦公室接待過我，聊天，並請我到雲起軒吃飯。以後到港中大，一定在雲起軒吃一次飯，這裏有美好的記憶。（去冬港中大新亞書院聘我為新亞儒學講座主講教授，歡迎我與內子的宴會也在這裏舉行。東道主請前校長金耀基先生與哲學系主任鄭宗義教授等作陪。金先生是劉先生的老朋友、鄭先生是劉先生的高足，席間我們很自然地聊到劉先生，都在擔心他的病況。）

一九九五年八月在波士頓大學舉行第九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蕭蓬父、湯一介、龐樸、陳來先生與我等赴會，在波士頓又見到了來參會的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先生等。我們與海外學者討論中國哲學的世界化問題。

九〇年代末，劉先生從香港中文大學榮休，到臺北定居，任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講座研究員、兼任研究員及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作為中研院文哲所諮詢委員的劉先生返回臺灣之後，在該所籌備處與李明輝教授主持了「當代新儒家研究」的兩個三年計畫，爾後又有延續，在南港多次召開小型學術會議，我也曾兩度參加。

二〇〇〇年，我推薦當時的博士生姚才剛以交流博士生的身分到東吳大學哲學系學習了三個月。在葉海煙教授、李明輝教授等學者的幫助之下，姚才剛獲得了臺灣「中華發展基金會」的資助。彼時我讓姚才剛赴臺，是為他以劉先生思想來做博士論文打基礎的。我希望他拜訪劉先生並當面向先生請益。才剛旁聽了劉先生為東吳大學哲學系研究生開設的「當代中國哲學」課程，還每兩週到南港去一次，專門向先生求教。劉先生為才剛答疑解惑，並就自己思想發展的淵源、脈絡、核心觀念及當時他著力思考的哲學問題做了詳細介紹與反思。姚才剛的博士論文《劉述先新儒學思想研究》，於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在答辯會上以全優獲得通過，並於二〇〇三年正式出版。這是第一部以劉先生思想為研究對象的博士學位論文。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為慶賀劉先生七十大壽，我與姚才剛赴臺灣中央研究院出席該院與東吳大學等合辦的「儒學、宗教、文化與比較哲學的探索——賀劉述先教授七秩壽慶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討論劉先生的思想。



二〇〇五年六月，劉先生偕夫人來敝校出席「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並做演講。劉先生與杜維明、成中英、蔡仁厚、戴璉璋等重要代表人物連袂出席。來自八個國家的學者二十多人，臺灣、香港地區的學者四十多人，全部與會者共一百四十多人，為一時之盛。劉先生在大會上做了主題報告，題目是〈中國傳統知識與價值整體觀之現代、後現代闡釋〉。會議期間，我們為大學生們組織了數場講座，讓來會的知名學者做演講，使武大學生一睹儒家學者的風采。劉先生的講座圍繞著「儒學、傳統文化與變動中的海峽兩岸社會」而展開。九月十一日晚，我們專程在漢口江灘邊的六合餐廳宴請來自海內外的學者，飯後遊覽江灘。劉先生伉儷、蔡先生伉儷都很愉快，他們很客氣，盛讚此次會議十分成功，氣勢很大，師生動員的力量很強，每場大會的聽眾都有兩百多人，講座的聽眾有四百多人。他們尤其感動的是，我們這裏從蕭蕙父、唐明邦、李德永三位老先生，到中青年老師，到研究生、本科生，都這麼團結，並努力地參與會議。九月十三至十五日，我陪與會的部分外國及臺港學者三十人遊覽武當山。當時高速公路還未開通，我們乘坐的旅遊大巴走的是普通公路，時間較長，路上較顛簸。儘管如此，學者們興致很高，劉先生與夫人、戴璉璋先生與夫人，還有當年已七十歲的周羣振先生與夫人（周先生腳上還有傷），以及日本、韓國的一些學者等，都登上了金頂。遊覽了武當山三大景點後，返回武漢途中，我們還參觀了襄陽古隆中。參觀之餘，我給朋友們講了武漢大學襄陽分校的故事。文革期間，我們的老師們下放到這裏，在這裏參加勞動，接受批判與改造。劉先生向我打聽江天驥、蕭蕙父、陶德麟先生當年的狀況，聽了我的介紹，唏噓不已。

多年以來，學界組織現當代儒學會議，都希望劉述先、杜維明、成中英、蔡仁厚、戴璉璋等先生同時出場，這五位先生一般不易到齊。後來，如二〇一三年，楊祖漢與李瑞全兄在臺灣中央大學、景海峰兄在深圳大學舉辦的會議，基本上做到了，真是難能可貴。只是二〇一三年以後，劉先生的身體比以前更差了。

二〇一四年七月，應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黃俊傑院長邀請，我到臺大做一個月的訪問學者，除參加主辦方的「第五屆青年學者『東亞儒學』研習營」，發表演講並參加「東亞儒學研討會」外，於七月十四日我還應中研院文哲所的邀請，在該所演講〈近年來中國大陸儒學的新進展〉。報告會由鍾彩鈞教授主持，劉先生在討論時第一個發言，說我太謙虛，報告中只是講別人的學術貢獻，沒有講自

己的。中午大家一起在中研院餐廳吃飯。飯後，劉先生還邀林月惠與我一起聊劉先生文集的編輯、出版等相關問題。

七月二十八日，為慶賀劉先生八十大壽，文哲所主辦「全球與本土之間的哲學探索——賀劉述先先生八秩壽慶學術研討會」，來自兩岸三地數十位學者與會。主持者與發表者有戴璉璋、黃俊傑、李明輝、郭齊勇、何信全、董平、鄭宗義、鍾彩鈞、楊儒賓、李瑞全等，我在大會上報告的題目是〈劉述先先生的學術貢獻〉。出席者中，我的朋友還有葉海煙、朱建民、林安梧、黃麗生、張壽安、林月惠、林鴻信及斯洛維尼亞的羅亞娜教授等。晚宴上，主辦者讓我代表大陸學者致辭。晚宴極溫馨，劉先生與師母、在海外工作的兩位公子與孫女都來了，我們觀看的照片集錦中，有反映劉先生的成長歷程及他參加海內外學術活動的剪影，有他與家人的生活照。師母劉安雲女士是一位翻譯家，他們伉儷合譯了休斯頓·史密斯的名著《人的宗教：人類偉大的智慧傳統》。這已成了我的案頭書。大家看看劉先生的〈校訂序〉，可知劉師母的才能。劉先生與師母對子女的教育完全是開放的，長公子劉豁夫 (James Liu) 在紐西蘭做心理學研究，曾任亞洲社會心理學會的會長，二〇一四年曾來敝校講學，二公子在美國做微電影研究。

最後一次與劉先生見面是二〇一五年十月下旬，我等到臺北出席由東方人文基金會、臺灣師大東亞文化中心、中央大學文學院主辦，《鵝湖》月刊社等承辦的「第十一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紀念牟宗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會議。十月二十一日上午我為博士生上《禮記》課，晚上與劉樂恒君搭乘華航班機直飛臺北，當時在臺灣做研究的謝遠筍君來接我們，搭車到師大迎賓館已經半夜了。二十二日上午到師大林口校區資訊大樓出席大會，劉先生與蔡仁厚先生等做主題演講，劉先生講的是〈牟宗三先生的幾個面向〉。會間我們好幾位學人分別到劉、蔡先生前問候，彼此寒暄。帕金森病的折磨，使劉先生更加老態，行動更遲緩了。當天中午他還要趕到政大，下午在那裏講課。不曾想，這次匆匆在師大林口校區的相見與告別，竟是與劉先生的永訣，從此陰陽兩隔！

劉先生十分關心敝校武漢大學的哲學事業。他與已故蕭蓬父先生是講友，劉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臺灣中研院工作期間，曾多次邀請、接待武漢大學的學者與學生，不遺餘力地關懷、提攜後學。十多年來，我的同仁、朋友、學生，凡到臺灣去，我讓他們一定要去看望劉先生。他也樂於接待，論學送書。他看好我們這個團

隊，認為是中國大陸儒學重鎮之一。他拿出積蓄，在敝校設置以他父母的姓名命名的「劉靜窗青年教師獎」、「王蘊聰紀念獎學金」，激勵青年研究儒學與新儒學。今年三月下旬，在湖北黃岡舉行，兩岸學者參與的「當代新儒家與當代中國和世界」學術研討會上，舉行了第七屆「劉靜窗青年教師獎」、「王蘊聰紀念獎學金」的頒獎儀式。臺灣學者潘朝陽、朱建民、楊祖漢、陳昭瑛、林月惠、周博裕、金貞姬等十多位教授見證了這一時刻。此次，我向月惠打聽劉先生的狀況，頗有些擔心。五月初，在河南嵩陽書院出席杜維明先生主持的儒學創新會議，再次見到月惠，從月惠那裏知道，劉先生的身體已經很差了，真是令人憂心忡忡。

劉先生的書在大陸出得較少，且沒有系統。我提議為劉先生編《劉述先文集》十卷本在大陸出版，得到劉先生的支持與鼓勵。我在大陸找過好幾家出版社，未獲回應，直到二〇一四年上半年，才得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王琬瑩編輯的支持。我與胡治洪、姚才剛教授等合編的劉先生文集，目前正在編輯過程中，編輯們正在全力加工，爭取儘早出版。劉先生對此曾十分期待，可惜他已經看不到這一套書的出版了，令人唏噓不已！我與劉先生之間有過一些通信，我記得保存有好幾封他的親筆信，論學或討論一些具體之事，可惜近忙，來不及查找、清理。此外，我與劉先生還通過一些電子郵件，近年集中談的是編文集的事，可惜前些年的電子郵件都刪掉了。劉先生在給我與他弟弟的信中，一再對我們這個團隊表示高度的信任。

劉先生是一位睿智、安靜、理性的哲人，同時又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他恬淡怡樂，超然物外，同時又熱情地接引後學。晚年的劉先生，不論是一隻眼失明，還是全身衰弱，每天仍堅持搭乘公車，然後步行較長一段路，到文哲所的研究室讀書寫作。生命的最後階段，常常跌倒在地，但他仍然如此執著地到研究室去，真是做到了含章內奧，剛毅堅卓；生命不息，奮鬥不止。他在與夫人合譯的史密士的《人的宗教》的〈校訂序〉末寫道：「人雖嚮往無窮，卻是有限的存在。每個人都必須植根於某一傳統之內，通過自己時空的限制去表達無窮。從這個觀點看，每一個世代，每一個個人都要盡自己的努力去探索，去追求……只要自強不息，與時推移，每一個人的努力都是我們所歡迎的。」劉先生盡到了自己的努力，他的生命從有限通向了無限！劉先生一生的哲學探索，值得我們再咀嚼，再反思！

文哲所發來的通告說，明天（6月20日）將在殯儀館設奠，為劉先生舉行家祭與公祭，移靈火化後，將假木柵富德公墓詠愛園松柏區，舉行樹葬儀式。樹葬是

環保的安葬方式，劉先生家人的這種選擇，是符合先生理念的。可惜我因事不能赴臺送先生最後一程，心裏很是歉疚不安。

沉痛悼念敬愛的師長劉述先教授！謹此向師母劉安雲女士、兩位公子及劉先生所有親屬、友人、學生、同事表示深深的哀悼與慰問之情。

2016年6月19日於武昌珞珈山

（本文初稿刊載於《鵝湖》第493期〔2016年7月〕，惟本文內容作者已另做增補，與初稿略有不同。）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儒者生命典範

朱建民<sup>\*</sup>

見到劉述先老師是很晚的事，受他影響卻很早。高中常跑書攤，在《柏楊雜文集》、李宗吾《厚黑學》等一堆盜版書中，赫然發現一本《文學欣賞的靈魂》，清新雋永、精湛深刻，哲思闡發文學心靈，貫以人性光輝的基調，使我免於一味憤世嫉俗的沾染。很難想像，這是劉老師二十六歲前的作品。不僅如此，稍前幾年，他已出版了兩本譯作：許懷徹《文明的衰敗和復興》和卡西勒《論人》，稍後幾年又出版了《語意學與真理》。青年的劉老師，學問生命已這般暢旺，因為才情洋溢之難掩，想必與他的家學根底和少年即立志於哲學也有關係。

我讀大學時，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引領風氣，成為青年學子重要精神資糧；其中即包括劉老師的《文化哲學的試探》與《生命情調的抉擇》。這兩本是劉老師取得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後的著作，也可視為他對之前臺大求學和東海任教兩階段思想的回顧與總結。在臺大時期，劉老師受方東美先生影響，用心於文化哲學。但在東海時期，與牟宗三先生相處，耳濡目染，終以儒家心性之學為安身立命之依歸。我初入臺大哲學系，即受劉老師文化哲學著作的啟蒙；加上接連兩位客座教授：孫智燊與吳森，都是南伊大的博士，也都深受方先生影響；一時間，文化哲學也成為我的主要興趣。讀研究所時，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陸續來臺大客座，親炙兩位儒學大師，不知不覺中，我也逐漸轉向儒家。此時再回頭讀《生命情調的抉擇》，才看出劉老師如何真切而自覺地找到了生命的定向，而這是他在三十歲之前已經完成的重大抉擇。

劉老師沒教過我，但我能出國讀博士倒是間接承受他的恩澤。臺大碩士班畢業後，我有幸留校任職，原想如此一生安於臺大，直到三十多歲，才興起出國念頭。

---

\* 朱建民，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

申請到幾個學校，都沒獎學金，只有南伊大給予極優渥的全額獎學金。抵美後，才發現南伊大對中國學生特別照顧，原來都是劉老師打下的基礎。他是在南伊大取得哲學博士的第一位華人，兩年時間即完成所有要求，以優異成績畢業，此記錄至今無人能破。他畢業前就登臺授課，隨即被爭取留校任教，三年後即獲升等、長聘，成為哲學系獨當一面的重要學者。在他任教南伊大的十五年間，為臺港學生爭取獎學金名額，先後十餘位赴此求學，皆蒙照拂。多年後，我問起這些學長的名字，劉老師仍能立即寫就一張名單。我到南伊大時，劉老師已離開，轉任香港中文大學。但是，長期下來，南伊大的教授和職員居然對臺港學生產生了先入為主的好感，讓我也獲得了情同家人般的照顧。這點令我感受深刻，尤其對比於其他外國學生，更形顯著。

二〇〇五年，第七屆新儒學會議在武漢大學舉行。會後，郭齊勇院長安排同遊武當山。那次，我見識到，劉老師未必以風景為樂，但依然態度認真。登石階時，劉老師走得太快，不慎跌了一跤，也不以為意，立即起身前行。下山後，順路到隆中，傳說乃諸葛亮出山前隱居地，有不少假古蹟，甚至用迷宮的概念造了八卦陣。同行者提議姑且一試，劉老師也是一步步認真走完。二〇一三年，第十屆新儒學會議在深圳舉行。當時劉老師帕金森病癥已顯，邁不開步。我趨前協助，他搖頭婉拒，師母也強調，他要自己行動，不願旁人攙扶。二〇一五年，新儒學會議在臺灣舉行，借用師大林口校區的場地。劉老師發表主題演講，中午匆匆用餐，就急著趕回政大上課，不願稍有延誤，而讓學生等候。

望著他堅持的碎步，感傷之餘，更多的是打自內心的敬佩。他每天上午搭乘社區巴士到中研院大門，步行到底端的文哲所，進入研究室，一直待到下班。除了中午到餐廳用餐之外，一如往常持續著研究工作，無視病情之輕重，亦未因其一目近盲而稍懈。劉老師曾以「學不厭、教不倦」讚譽我的博士論文導師艾慕士，其實他自己更是如此。劉老師曾說自己這種生活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但他這句話絕不是一般理解的消極意思，而是忠於生活中的每一個時刻，忠於生命中的每一個位置，忠於自己所選定的學術工作。劉老師很清楚地掌握這種生活態度，也持之以恆地實踐著。因此，相較於他那一輩的成名學者，劉老師顯得更加沉穩堅定，也累積了更紮實、更豐盛的成果。

每逢他人問及病情，劉老師陳述己身狀況，客觀冷靜，如言他者。去世前數月，體力明顯日衰，但行止仍依平常，未曾措意。於生死之事，不憂於心，息於睡

夢之中，死後骨灰與大地混同；唯真知生者，能臻此知死之境。多年前，劉老師已謂此生無憾。「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其一生盡其在我，寧於生死之際，實乃儒者生命典範，可貴之至；能於此生見證，實亦我等後輩之幸。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生命完成於未完成之中 ——敬悼吾師劉述先先生

李瑞全\*

劉述先先生原籍江西省吉安縣清水鄉，祖父劉理堂公時始移居上海。一九三四年劉先生出生於上海。一九四九年先生十五歲，大陸動亂，戰事已蔓延到上海，先生承父親劉靜窗公之命，與堂哥南下廣州轉到臺灣求學。靜窗公原指定先生修讀經濟學，但由於遭逢世變，在赴臺輪船上，見浪花起伏，感到生命與國家民族之意義與出路不明，途中決定專研哲學，以解心中之疑謎。在臺修讀二年高中，期間備嘗生活居所貧困之苦，但不以為念，仍專心致志於自己理想而一往無前。高中後，進入臺灣大學哲學系，受業於方東美教授，慨然有為新時代建立新哲學的構想，而又以宏大的文化哲學為目標。碩士畢業後，獲邀任教於東海大學，與牟宗三、徐復觀兩位先生論學於臺中，奠定中國哲學之歸宗。其後又得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教授之薦，赴美攻讀博士，專研美國神學，畢業後留校任教，至教授之位。七十年代初，先生應唐君毅、牟宗三二位先生之邀，開始到香港教學，後辭去美國教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擔任系主任，榮升講座教授；在香港任教二十多年，晚而退休，受聘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為特聘研究員，並在臺灣多所大學授課。

劉先生以文化哲學之建構為目標，特喜卡西勒之符號形式哲學。卡西勒的文化哲學體系對先生一生的哲學發展，實具有深刻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劉先生自早歲與牟宗三先生論學，同時也確立了當代新儒學的基礎和方向，日後更接上宋明儒學「理一分殊」之旨，作為哲學之核心觀念，以推廣當代新儒學的發展。因此，劉先生回到香港中文大學即全力發展宋明儒學的專精研究，寫出三十萬言的朱子哲學，

---

\* 李瑞全，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表明回歸當代新儒學之決心。此與後續完成之黃宗羲哲學，乃是對宋明儒學之返本開新的詮釋，意在進一步發展儒學在當今的意義與貢獻。此中的創見，主要是對「理一分殊」之一系列的全面和創造性的詮釋，以此吸收和消融中西哲學的要義，進一步推展中國哲學到世界哲學中去。劉先生更運用此一原則，對於國內外當前的許多文化與政治爭議，如民主與民本、現代化與後現代化、理想與現實、民主制度與德治等，做出了有力的分析和回應。

劉先生對「理一分殊」的詮釋，主要在提升「理一」為超越的「道」，中西各主流哲學之學理乃是對此「道」之「分殊」的詮釋。先生之意不但以此通貫儒釋道三家的義理，作為當代新儒學的基礎原則，而且用以吸納和批判西方當代的哲學與宗教思想。先生赴美時即見出西方當代宗教哲學和神學，有可與儒學相融之處，亦可藉此擴展儒學的體系。先生於卡西勒哲學特取其「功能統一」取代「實體統一」之說，用以消化中西哲學與宗教之各種分歧。「理一分殊」不但可用以分判西方哲學中的論述，也可以提供一方向，以解決諸如分析哲學、歐陸哲學的困境。劉先生藉此提出不同於「絕對一元主義」與「相對多元主義」的第三條路。在宗教哲學上，劉先生藉「理一分殊」來發揮功能的統一，以田立克之「上帝的上帝」作為諸宗教之「上帝」，即功能上的統一，是為共同的「理一」；同時容許各宗教對此功能意義的「上帝」做出不同的詮釋，不同宗教都是此理一的「上帝」之神聖性所做出分殊的詮釋，彼此可以並行不悖。劉先生由此以論述宗教之多元與和平共存之道，回應孔漢思建立「普世倫理」之呼籲，提出儒學的解決方式。這是當代新儒學可以有進於西方宗教哲學，和有貢獻於普世倫理的發展之處。

劉先生更進而一步步開展「理一分殊」的哲學意義。在〈「理一分殊」的現代解釋〉一文最後引用莊子的「兩行」之說，以說明「理一」與「分殊」是同時並行的「兩行」。因此，劉先生不久即發覺此原則需要加以申論，乃另為長篇之說，正式提出「兩行之理」，以輔助「理一分殊」之說。劉先生引述莊子之說，以「兩行之理」，吸收道家之「有為無為」，佛家之「緣起性空」之義，更盛發儒家之「天人合一」、「良知與天理」、「心性與天道」等義理。基本上是以「超越」和「內在」為兩行，由此以見出，儒家之哲學實為包括超越與內在兩面的中道圓融的哲學。但劉先生的哲學運思並未到此為止，日後又進而提出「迴環」的理念，以補充「理一分殊」與「兩行之理」的說明。有趣的是，在〈「兩行之理」與安身立命〉一文的結尾處，劉先生已表明儒學之特色在於「是在超越到內在、內在到超越的迴

環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所謂迴環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是指出超越與內在之兩行並不是各自為政，分為兩截，而是在一動態的迴環之中的「既內在而超越」，又「既超越而內在」的動態結合。儒家自是不離開人間世界，但並不限於內在或現實的生活經驗中，而必由內在而嚮往超越。儒家也不停駐在超越而不返，亦必由超越而回歸於內在，在現實世界中呈現超越的價值。超越與內在是一圓轉無盡的動態的歷程。因此，必有當下即是既內在而超越的實踐，此正是劉先生所確立的安身立命之所。劉先生認為此三原則是自己哲學的三部曲。

劉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晉升為講座教授時，即提出系統哲學的構想，改造哲學之知識論、形上學與價值論，以成就一當代哲學體系的宏構。當時亦自謙，謂非一人之力可完成。數年後，劉先生又進一步修訂自己的哲學工作為完成方法論、形上學與踐履論之三部分，這是劉先生一生念茲在茲的哲學工作。「理一分殊」、「兩行之理」與「迴環」可說是此一理念所建構的里程碑。

劉先生晚年不幸患帕金森氏症，行動緩慢吃力，食量日減，但仍然每天到文哲所研究室進行研究，指導研究生，笑謂「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惟健康日消，終於在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於睡夢中辭世，得壽八十有二。先生深明哲學沒有完成或終結之理，服膺「生命完成於未完成之中」，並無遺憾之感。是為哲人之終極完成。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敬悼劉述先先生

楊祖漢\*

劉先生常說他是新儒家的第三代，的確，他作為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是當之無愧的。在牟宗三先生去世後的這二十年，劉先生對於維持當代新儒學在國際學界中的地位，給出了很大的貢獻。他中西哲學的造詣都非常深湛，在國際間學術友人很多，藉著他的中英文著作與出席會議，新儒學的思想理論得以不斷向外傳播。對於國際學界所重視的文化思想或宗教的問題，也常看到他的發言與評論，他這種地位與作用是難以取代的。他的去世造成了新儒學陣營的莫大損失。可以說，劉先生已經善盡了作為第三代當代新儒家的代表的責任，我們應該衷心感激他。第三代新儒家的特性，在劉先生身上有很清楚的表現，他也很自覺地與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二位先生的觀念與做法做出區別。他認為唐、牟二先生處於中國文化存亡絕續的時代，故當務之急是要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學術保存下來，態度未免激切，有過於強調中國文化的優秀之情況，如：認為只有儒家是人生的常道，也是最高真理之所在。劉先生認為這樣說會有排他性，這樣的強調並不適合於現代世界。他說現代世界已經是地球村的時代，在許多大都會，會有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者聚居在一起，如果只強調某一宗教或哲學是常道，甚至是唯一真理所在，會難以承認異己者所信所守的價值，而容易造成衝突。因此劉先生認為，我們固然要強調儒學的精義，但只需要說明儒學自有其站得住的立論根據，是可以使人安身立命，及作為民族的精神傳統，如此就可以了，不必說儒學比其他宗教優勝。劉先生這一見解表現在他對「理一分殊」的新詮釋上，他認為世界各大思想與宗教的傳統，都是理的分殊表現，都有其價值，但都不能自認為是唯一的真理，任何教派都不能獨占真理本身。故對於「理一」只能努力去追求，不能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劉先生這一

---

\* 楊祖漢，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見解當然是很通達，又能夠適應時代的要求的，也確不同於唐、牟二先生的看法。唐先生的心靈九境論，雖然也承認基督教、佛教與儒家同屬絕對境，但儒學的天德流行境是第九境，為最高，而且可以通九境。唐先生當然有儒學是最高境界之所在之意。牟先生的《圓善論》，雖然有取於佛教天台宗圓教理論，認為天台圓教的不斷斷、三千法不改而同是佛法之說，可以解決圓善（德福一致）如何可能的問題，但仍然認為儒學是正圓，此意在《現象與物自身》說得更為清楚。依劉先生之說，這是第二代新儒家為了保存中國文化與儒學，不得不然之說，而唐、牟二先生對儒學與中國文化也因此而給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闡揚。但在現時代，就不必如此強調了。劉先生所說的理一分殊及「兩行」之理，對此義做了非常清楚的表示，也成為他很鮮明的主張。當然，這與第二代新儒家的不同見解，是有關哲學與宗教，或人生的方向、宗趣的抉擇，或終極關懷的問題，是否可以如此通達地承認其他各種宗教呢？這一問題當然是可以繼續討論的。

劉先生認為，當代人類面對兩個越發嚴重的危機，一是各種宗教信仰的衝突，二是人對自然生態的戕害，此兩大危機如果不克服，人類便會趨於自毀。劉先生認為要克服此兩大危機，必須從人的心態上做改變或轉型，他在這方面的省察是非常深刻的，這是他參與普世倫理的運動之用心，他在這方面的見解與上文所說的理一分殊的新詮也是有關係的。人必須既肯定自己之所信，又同時承認與自己不同信仰者所信的價值與真理性。我們如何能夠既肯定自己所信為真，又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者所信的也有其真理性呢？故對於理之一的不敢獨占，對於自己所信只肯認其為真理的分殊表現，便是一必需要有的心態。分殊者固然是從理一而來，但並不就是理一，如此就可以保住了不同宗教信仰者做會通與互相承認的空間，故此一觀念應可以作為宗教對話的基礎。再進一步，人的盡己性、盡人性，以體現天道，這是內在超越，但同時也要強調超越而內在，即必須跳脫人類自我中心的限制，對天道天命保持尊敬。劉先生所說的超越與內在的迴環，表示了超越性與內在性互相補充，不能偏廢；除了宗教對話外，這對於解決人類破壞生態環境的問題，也給出了很好的提示。又，劉先生所說的兩行之理，理一與分殊並行，即不能以理一而抹煞分殊，也不能因重分殊，而不肯定真理有其普遍性。劉先生這些想法都頗具精思，比較第二代的新儒家，也顯出其特色，態度上似乎更為謙退。這種不敢自居於己，體證了真理，只求自己努力的不斷超越的見解與心態，的確是可以使人不斷突破自我的限制，而突破由自我的限制而形成的偏見，力圖與異己者做溝通，確是克服現代人類

困境之良藥。

劉先生對於鵝湖及東方基金會的事務是非常關心的，我們所主辦的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辦了十一屆，除了臺北之外，也曾在香港、深圳、濟南、武漢等地舉行，在我記憶中，劉先生是每屆都參加的，或發表論文或做主題演講。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十月間，他雖然已經抱病，但仍勉力論述他最近的心得，對牟先生的生命與學問的幾個面向給出了詮釋，聽者無不動容。劉先生許多重要的文章，都交給《鵝湖》月刊發表；而他又是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的董事，每次基金會開會，如果劉先生在臺北，也都會參加。前年在中央大學當代儒學會議結束後，我們請了一輛車送劉先生回臺北住處，並由我陪同。途中劉先生很鄭重地跟我說，鵝湖很重要，要好好辦，並說會盡力幫忙。這是我很少有的與劉先生深談的經驗，也使我體會到劉先生的性情，其實不只是平常大家所看到的平淡、溫文的學者氣象，他的內心情感也非常真摯而濃烈的。

記得牟宗三先生說過：「一個民族到不會表現觀念時，就沒有了生命 (no idea therefore no life)。」劉先生作為第三代新儒家，提出了他因應這個時代的新觀念，如上文所說的理一分殊、兩行之理、多元互濟等。劉先生之後，我們能提出什麼新的觀念呢？

(本文原刊載於《鵝湖》第 493 期〔2016 年 7 月〕，承蒙鵝湖月刊社授權轉載，特此謹申謝忱。)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劉述先先生的道統詮釋對當代新儒家的 當代啟示

潘朝陽\*

「道統」的觀念，有一文化歷史脈絡相承，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聖王和先師之道的世世不斷之相傳，而形成了中國文化歷史之核心統緒。如果追溯歷史，則孟子已開其端，而韓昌黎在其〈原道〉一文中，清楚地陳述了這條文化歷史的常道之統緒，但韓氏只是於其文章中點到其線索，並未能於哲理中深論。

劉述先先生指出宋儒在哲理上真正創立了道統論。在宋儒的時代思潮的緊張對立中，他們面對了佛老二氏，宋儒的確是受到二氏之學的刺激，而覺悟不能在傳統的窠臼之內固步自封。所以程朱大儒們多出入於道釋有年，而後歸返《六經》，始知吾道自足，如二程昆仲以及朱子，都是這樣。此種學習歷程證明，宋代程朱大儒都是心胸開闊、不拘門戶的豪傑之士，不是固陋守舊而抱殘守缺者。但他們也明白，孔孟之道的精神絕不可失。所以，朱子從學於李延平，向他問儒家之常道，而有體悟之後，就明白在那個時代，他必須在文化和道術之中，釐清儒家與二氏特別是佛教之分疏。所以才有堅強清楚的「道統論」。

道統之論，現代有另外的提法，雖然不像宋明儒以道統為一個重要的儒家思想關鍵詞，但當代儒家也有道統的觀念和堅持。

如上之論，程朱理學雖然吸收了佛道兩家的理論，故三教有其同處。但劉述先先生點出儒佛之差別，他說：「依儒者之言，則人倫日用不可廢，仁義禮智根於心，性理之實即本之於生生而不容已之天道。其體用本末，皆與佛氏迥異。」所

---

\* 潘朝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地理系兼任教授。

以，宋之理學居於儒家的立場，強調的是人倫日用不可廢，仁、義、禮、智根於心，這個關鍵，與佛氏完全不同，而且理學家視天地與心性皆為天道生生不已的發用流行，此與佛氏主張的世間一切法如幻如滅，是完全不一樣的觀念。

劉述先先生再指出，宋儒的深刻之文化歷史意識，他說：

我們可以看到宋儒與先秦儒的連貫性。把時間推回到遠古正是先秦儒的一貫作風，所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孔子相信這裏有一條一脈相承的線索，所以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孟子更演繹出一套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歷史哲學觀。宋儒所繼承的正是這一類的觀念。……千聖相傳，只是此心，以心印心，自然不難了解聖人的命意所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是真心嚮往堯舜的盛世，所繼承的是文武周公的理想，而這是把道德融貫入現實政治的理想，朱子所崇信的也還是同樣的理想，……朱子堅強的信念的真正根源是在千聖相傳之心，以及此心所把握之實理，這些是用切問而近思的方式，當下即可以體證的道理，不是時代淹遠不可追索的上古遺跡。

劉先生這一大段敘論，很清楚集中地說到了儒家非常重視文化歷史意識，文化歷史的理解，不是實證主義的泛科學論的那種史料學派所以為，存在一種「絕對客觀主義的歷史」。儒家從孔子以降一直到宋儒，固然都承認「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的歷史之器物層、制度層之客觀性；但他們更主張肯定文化歷史的巨流之中，其最關鍵核心者乃是「千聖相傳之心」，這是道德良知之主體心，世世代代「以道德心印證道德心」。唯有此路，才是中國文化歷史真正得以相傳幾千年而不滅之故。

當然，劉述先先生此處所言，其古語就是「道統」，只是特別突顯了文化歷史的意識之脈絡傳承之意思。同時，他也畫龍點睛地說明，此文化歷史意識的中心即是「仁」。他指出，宋儒的中心理念，就是天道人道之共同根本的生生之仁，而此觀念乃是孔子之終極關懷。所以，中國文化歷史意識，從孔子歷宋明儒家而一路傳承至現代，就是主張天地宇宙和人心之剛健生生而不息的仁道。

劉先生申論宋儒，特別是朱子延續並開創的中國文化歷史意識中的道統觀，點明何以會有道統的堅持，乃有其時代文化和思想的對蹠性；宋時，承唐末五代人文精神之凋敝和政治社會之頹廢，而在思想上盛行佛老二氏的空無出世之說，故有北宋四子之承孔孟剛健之乾坤一元的仁道而起，由此重建儒家的常道慧命。宋、元、

明、清四朝，積千餘年，中國人以及中國社會，都有以孔孟儒學為主旨的道統觀的基本生活信仰。儒家的道德倫理成為明清社會三教的中心價值，是中國傳統士人和庶民的生活指向。

當代新儒家熊、牟、唐、徐四先生的學問，與時下一般學者有很根本的差異，就是四位先生的學問，是具有強烈明著的儒家道統的學問；而後者的為學，只是各類「一曲之學」的知識性質的知識之學而已。如果用宋儒張橫渠的話語來說，即四先生之學是以「德性之知」為首出，而「見聞之知」附從之的學問進路；現代一般學者則是以「見聞之知」為進學致知的唯一目的，至於「德性」的修養，是宗教信仰之事。故上教會聽牧師講《聖經》為基督教徒，上佛寺聽師父說佛法為佛教徒；是在教堂、寺院的他律之路而建立自己的道德生活律，甚至根本只有「見聞」而不須「德性」，現代人的生活是以各種法律為軌範的。四先生由宋明儒學上溯孔孟道統，故德性之知源於本心良知，這是不須上教會或佛寺的儒者的自律道德的生命形式。

劉述先先生是當代新儒家第三代大儒，其德與學的根本形態也是如此。然而劉先生之學強調「理一分殊」和「全球倫理」。「天道」雖是不與「多」對的「一」；天道之作為那個「絕對一的本身」是超越者、絕對者，但它必須於繁興多元的大用之中顯發。孤懸的道對世界而言是無意義的，它必在全球人類各大文明體系和內容中存在。因此，道統不是內縮而僅成為道德心的自己本身，以致於成為孤懸的「獨體」；它必是一種發散並內蘊於形形色色的文明、學術、思想之中。所以，在劉先生的觀點，「德性」和「見聞」之知是合而為一，德性須在見聞中顯現；見聞則以德性來貞定。劉先生批評朱子以及傳統儒家，往往太將心思著重於道體之本身，突出純粹化的天理，使其高高在上。傳統中國儒家的「道問學」，民國以來不少學者以為，是如今日之純知識之追索和認知，又以為朱子強調之格物之學，就是今日科學的路數。劉先生指出，其實皆是誤會比附，傳統理學和心學家，其問學和格物，均屬修德之事，於其等的進德修業之局裏，「見聞」是餒萎的。在當代，由知性、理性而來的客觀架構下具有獨立義之「見聞之知」，中國儒家應予以發展。而劉先生的說法和關心，牟宗三先生實則亦已論述過，此即現代意義下的「新三統」中的「新學統」之闡揚發揮。劉先生不使用「『由良知之自我坎限來開出知性主體』以發展『外延式、架構式理性』意義下的知識」此種述語，此是牟先生的造詞。劉先生認為「理一分殊」而「兩行一致」，即人之理性心，本來就可以發展現代性的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傳統儒家的學問中，他們的思維只是「人文學」，但並不表示中國儒家的心就欠缺此種科學理性。而在今天，我們主張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仍需當代的「中國之道」，但此道是指，當代中國人既有自身的長遠貞定堂正的文化原則和方向，故應有自己的文化形式，亦即是由堯、舜、孔、孟、程、朱、陸、王一脈傳下的核心價值。此文化形式是開放的系統，它可以欣賞並吸納全球各大宗教倫理以及科學。此種心態與宋明儒的關佛而堅持儒家道統，以及視見聞之學為第二序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然而，雖然劉先生將「見聞之知」從「德性之知」之籠蓋之下提出來，使其有獨立平等義。此亦即在道統之外，積極正視獨立性、平等性的學統。兩行平等而一致的主張，使當代新儒家的「尊德性、道問學」之功夫，既有同於傳統儒家，亦有超越於傳統儒家，而具有了新意義。可是劉先生又語重心長地提醒：

道德的踐履，在今天看來，似乎迂闊不切實際，只是少數人事，與多數群眾無關，但其然豈其然哉？西風東漸之後，現代人強調的是人權觀念，不再是責任觀念。然而即在西方，教育子女仍不能不講究訓練。……一個社會真要完全缺乏了道德自律，還成怎樣一個社會？所謂不誠無物，一切都要垮臺。人自不能人人為聖人，但也不能個個是自然人，在利欲膠漆盆中翻騰，沒有半點理想的嚮往。

當代新儒家從熊十力先生到牟宗三先生以至劉述先先生，都重新詮釋「一心開二門」的「心生滅門」，使其超脫佛家、道家、儒家之傳統消極性，而令其具有正面積極客觀性；從此而能並建德性和見聞兩個學術、思想、文化、心靈的巨柱，如此整體文明方有均衡穩定的基盤。三代大儒傳承儒家現代化之理路，有共同終極關懷，雖用語有別，但其心則一。

劉述先先生是第三代當代新儒家的重要傑出儒者，但明顯地顯示出他與第一代的熊先生和第二代的牟先生有一種差異。熊、牟兩先生之講學之性質近乎「論道」，兩位大儒均具有「書院山長」的氣象和味道。而第三代的劉先生之講學之性質，則顯然更近乎「論學」，他是典型的現代大學中哲學系的哲學學者，在劉先生身上看不到「山長」。

然而，他也在其論朱子的專著中說到，朱子大儒的一生最有意義的生命實踐，不是從政做南宋的官，而是在人文道德的教化工作中做出了不朽的偉大貢獻。我們都知道，朱子的弘揚儒家道統之教育工作，並非在官學中，而是在民間書院完成。

就當代新儒家的傳衍觀之，劉述先先生之後的第四代、第五代年輕一輩的弟子們，似乎多只是在大學的系所中擔任教授，依據現代高教體系和結構而開設課程；儒家道統在教室中講來講去，卻不知不覺地異化為「見聞」，而喪失了「道義」矣。今日大學如同以前的官學，一旦儒家常道被吸納於現代科舉膠漆盆中，當然也就沒有道統可言，學統固然須客觀獨立於道統，但道統卻不能失去。劉先生已離開人世，而與我們後學者永別。未死者之我們，特別在當代儒道淡薄而學風西化之時，儒家的新三統觀，特別是新的道統詮釋，有必要在民間社會，運用書院之教而傳承弘揚。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敬悼劉述先先生 ——兼論臺灣在文化上的自我定位

李明輝\*

劉述先先生於六月六日凌晨在睡夢中病逝於其臺北寓所。當天中午我便得知這個噩耗。近幾年來，劉先生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先是他的一隻眼睛因手術失敗而失明。繼而他被證實得到帕金森氏症，行動能力急劇下降。因此，他的溘然辭世雖不完全令人意外，但也來得有點突然。

劉先生原籍江西，但是出生於上海。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八年他就讀於臺灣大學哲學系，取得碩士學位後，到東海大學哲學系任教。一九六四年，他赴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就讀，於兩年後取得博士學位。一九八一年，他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哲學講座教授，直到一九九九年退休。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在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努力之下，成為當代新儒學的重鎮。劉先生的加入延續了這個學統，因而被視為當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與杜維明及余英時先生齊名。

一九九一年，我從中國文化大學轉往剛成立一年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以下簡稱「文哲所」）任職。劉先生從文哲所成立之初便擔任其諮詢委員。一九九二年戴璉璋先生接任文哲所籌備處主任後，我們打算推動大型的研究計畫。當時大陸學界在方克立與李錦全的領導下，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大規模的「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戴先生便邀請劉先生及臺灣大學歷史系的黃俊傑教授（也是文哲所的合聘研究員）共同商量。由於戴先生、劉先生與我都與當代新儒家有共同的淵源，而我們認為：在大陸學界推動現代新儒家研究的時刻，我們不能缺席。於是大家很快就取得共識，決定推動為期三年的「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

---

\*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由戴、劉兩位先生擔任主持人。

不料，當文哲所向院方提出這項計畫時，卻遭到何炳棣院士的激烈反對。他認為這項計畫沒有客觀的學術價值，只是在宣揚特定學派（意即新儒家）的觀點。後來，院方勉強同意先讓我們試辦一年，以觀後效。隨著計畫的順利進行，反對的聲音才逐漸消失。之後戴先生因行政工作繁忙，不暇兼顧，才改由劉先生與我共同擔任計畫主持人。這項計畫共進行了六期十八年，使文哲所成為當代儒學研究的重鎮。在劉先生晚年，我是與他最親近的工作助手。他雖是長輩，但絕不倚老賣老，而是負責掌握大方向，並藉由他在國際學界的影響力，將這個研究計畫推向國際，我則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藉由這樣的分工與合作，這項計畫進行得非常順利，也取得可觀的成果。

劉先生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便回到臺灣，在文哲所擔任特聘研究員。他在中研院附近買了房子，作長期定居的打算。直到二〇〇四年他年滿七十歲時，才再度從文哲所退休，改任兼任研究員。在他退休之後，文哲所特別禮遇他，為他保留研究室。他幾乎每天都到研究室工作，即使在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之後，依然如此。直到逝世為止，劉先生都在政治大學哲學系以講座教授的名義兼課。近一兩年，他的體力急速下降，上課時聲音很小，即使用麥克風，學生也聽得很吃力。但他仍然堅持每週去上課，誠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劉先生的辭世在大陸的學界及媒體引發了強烈的關注。大陸重要的網路媒體都大幅報導了此一不幸的消息。我也不斷地從電子郵件收到大陸學者的唁函及追悼文字。反觀臺灣的媒體，只有《聯合報》刊登了一則不大不小的報導。對於這位當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之逝世，臺灣的學界與社會似乎漠然視之，令人感慨不已。

去年清華大學楊儒賓教授出版《一九四九禮讚》，肯定一九四九年從大陸來臺的知識菁英對臺灣文化的重大貢獻。在「去中國化」儼然成為政治正確的當今臺灣，這種呼聲似乎是不合時宜的。約二十年前，我經過法國羅亞爾河畔的古城昂布瓦斯 (Amboise) 時，赫然發現義大利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達文西的墳墓竟然就在此城，而感慨此城何其有幸，成為達文西歸骨之處！

一九七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唐君毅先生的遺體由香港運來臺灣，安葬於觀音山麓。因為當時香港尚是英國殖民地，故唐先生選擇臺灣作為其歸骨之地。一九九五年在臺北逝世的牟宗三先生也安葬在新北市的新店，而非原籍山東棲霞。原籍湖南長沙，長年在香港任教的勞思光先生因反對共產黨，終生未回到大陸。他也一貫反



對國民黨的戒嚴政策。在臺灣解嚴之後，他才到臺灣任教，直到二〇一二年逝世，安葬在宜蘭。劉先生也是在解嚴後定居於臺北，而以文哲所作為其學術生命的歸宿，最後安葬於臺北市的富德公墓。

這些原籍大陸的知識菁英，之所以都將臺灣當作其精神故鄉與歸骨之地，除了因為臺灣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之外，也因為臺灣是華人世界唯一的民主社會（儘管還不完美）。這正是臺灣文化最可貴之處，也是臺灣文化之優勢所在。劉先生對臺灣的認同，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他以其父母之名在大陸設置了兩個獎學金，以祖父之名在臺灣設置了一個獎學金，在香港也設置了一個獎學金，嘉惠兩岸三地學子。他的視野與胸襟超越了海峽兩岸的政治藩籬。可惜在目前日趨民粹化的政治風氣中，臺灣人似乎已逐漸喪失了這種文化上的自信與胸襟，取而代之的是狹隘的胸襟與短淺的目光，實在令人憂心。在我們為劉先生送行之後，對臺灣在文化上的自我定位應深加省思。

（本文的刪節版曾刊於 2016 年 6 月 27 日的《聯合報副刊》）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詮釋再詮釋 ——談劉述先先生的意義哲學

鍾彩鈞\*

### 一、前言

劉述先先生於二〇一六年六月遽歸道山，海內外同感震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是劉先生最後工作的崗位，回想先生從研究員、特聘講座，到兼任研究員，大約二十年的光陰，幾乎每天往返於研究室的身影，如此規律的作息，老而彌劬的精神，令人無限地懷念與感佩。文哲所何幸有劉先生的帶領，得以在中國哲學、比較哲學上不斷有成果出現，允為當代新儒學的重鎮。先生往矣，作為文哲所的晚輩，雖然沒有全面繼志述事的能力，也應在自己本分上發揚先生的學術思想，使先生的精神能夠傳承下去。

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是一九七九年夏天，那時我是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的碩士生。那一年東海大學創辦了哲學系，馮滬祥主任特地在暑假舉辦中國文化研討會，作為創系的第一個活動。在親炙大師的精神嚮往，與白吃白喝的物質鼓勵下，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研究生蜂湧而至。大夥兒白天認真聽講，夜間更在寢室裏自發地開討論會，舉凡課堂見聞，到時事、政局、儒林人物，無不取來月旦一番，得意處則鼓掌狂笑。當時年少輕狂的模樣，猶歷歷在目。劉先生是講師之一，當時才四十五歲，大概是最年輕的一位，然而在文化哲學、中西比較哲學上已經很有名氣。那時《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等書尚未出版，還沒有新儒家世代之說，然而大家已經公認劉先生將接下新儒家的棒子。

---

\* 鍾彩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對於劉先生演講的內容，我已不復記憶<sup>1</sup>，但他一再地說對傳統文化要「詮釋！再詮釋！」(Interpretation! Re-interpretation!)卻留給我深刻的印象。近讀劉先生少作《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sup>2</sup>，其中屢次出現這個「詮釋！再詮釋！」本書大半寫於東海大學執教時，而寫成於剛赴美國攻讀博士的一九六四年秋天，是年劉先生才三十歲。從劉先生學習歷程來看，他從大學至初任教職，即已廣泛涉獵當代新儒家與西方哲學的著作，碩士論文為卡西勒的文化哲學，赴美以田立克的宗教哲學為對象。書成時博士課程才剛開始，則這本初試啼聲之作，表達的是他的獨立思考與未來規劃。在有關劉先生學術思想的研究中，此書並未引起很大注意。鄭宗義君則盛稱此書，並有仔細的介紹，認為其中展示的思路，是劉先生一生哲學的基礎與信念，且謂此書寫成於矢志博覽的青年時期，呈現一種浪漫感<sup>3</sup>。本文呼應鄭君的提倡，對其中的「意義哲學」加以探討。

## 二、意義哲學的提出與發展

本書面對的問題，是二十世紀以來哲學重新定位的問題。傳統哲學尋求宇宙人生的終極真理，但在科學不斷進步，人類不斷利用科學解決問題，也不斷累積科學知識的現代，哲學仍然以非實證的方法，抒發經驗界以外的所謂宇宙人生全體的真理，而各家的說法又彼此矛盾。於是在現代科學的挑戰下，傳統哲學面臨全面傾覆的危機。二十世紀以來哲學家就共同面對這個問題，而提出各種處方。本書分為八章，第一章論科學哲學。二十世紀以來哲學的危機，就是傳統的形上學無法證成，而最先想到的藥方就是科學哲學。劉先生說，如果科學哲學指的是立基於科學知識而加上玄想的「科學的哲學」，則它仍然是被批判的玄學（頁3）；如果是指對各種科學做基礎的或後設的說明之「科學底哲學」，則可發展成廣義的知識學，

<sup>1</sup> 劉先生談的是哲學與時代問題。講稿及相關的筆談、文章，集結為《中國哲學與現代化》，1980年由臺北時報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見姚才剛：《終極信仰與多元價值的融通——劉述先新儒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32。

<sup>2</sup> 劉述先：《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

<sup>3</sup> 鄭宗義：〈全球與本土之間的哲學探索——劉述先先生的哲學思想〉，鄭宗義、林月惠主編：《全球與本土之間的哲學探索——劉述先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頁1-35。對《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的介紹在頁3-13。

卻仍無法取代傳統哲學的地位，亦即人們對於整個宇宙人生真理的尋求（頁 37）。第二、三章討論文化哲學與意義哲學，它們是劉先生為新時代哲學建議的另外兩條途徑。劉先生的碩士論文研究卡西勒的文化哲學。本書以宗教現象學為例介紹其學說並說明得失，卡西勒提出知識現象學或符號形式哲學，是一種歷史或現實的描述，雖然攝所歸能，且能平等對待不同的文化體系，但不能處理儒家這種不屬制度宗教的宗教性<sup>4</sup>。認真面對後者，就進入意義哲學的領域。宇宙有各種真實性，如哈特曼以物質、生命、心理、精神四個層次同是宇宙所呈現的真實（頁 99）。如果分物質、生命兩層來看，二者是互攝的，物質世界是人之所見的物質世界，因此呈现在人生面前的物質與生命的二元世界，實在只是同一個人性世界內所攝握的兩個層面而已。但整個的人性世界又是客觀宇宙裏面的一個層面（頁 107）。意義哲學一方面和卡西勒的文化哲學一樣，平等看待各層次的意義，從物質科學到哲學的各層次，都以自己為中心建立一個意義系絡，因此每一層次都有專屬的學問，都有其存在價值。另一方面，作為整全之學的哲學，其最中心的工作是為這些意義系絡做一管理的安排，使人生得到一種最安樂最有價值的命運。

意義哲學尋求價值。價值判斷的原則並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體的普遍性」。在價值的領域中，我們要去建立的乃卡西勒所謂的某種「透過主觀的客觀性」，而不是一種純粹無條件的抽象普遍的客觀性。古代的智慧雖不能一成不變地搬到現在，但是它卻有一種啟示性的作用，可以幫助我們今日的人把握自己生命實現的原則。一個清晰思想的哲學家，決不要為人類去追求一條實質上普遍的價值判斷的原則，他所追求的僅只是適用於他自己時代的真理，同時企圖建立某種形式上的原則，透過啟示性的功能而成為懸於萬世的明燈。可見價值判斷的普遍性乃存於具體的「啟示」，而不在抽象的「推概」或一般化（頁 115-116）。總而言之，價值是普遍的，然而存在於主體的具體理解之中。

意義哲學與傳統哲學最大的不同，在傳統的形而上學企圖把哲學建立成為關於實體的知識；意義哲學認為，哲學更重要的功能是依於智慧對於此岸的意義系絡作合理的抉擇與安排。哲學的功能，是人類一種自覺的智慧的努力去認識生命的本

<sup>4</sup> 姚才剛指出，卡西勒的功能統一與規約原則的概念對劉先生思想有重要影響，但劉先生仍以為，卡西勒的心靈畢竟是純知的，對價值的體認方面顯得不甚真切。見姚才剛：《終極信仰與多元價值的融通》，頁 111-113。

質，把智慧透過啟示的方式，建立成為一個與知識同等堅牢的傳統，一代一代傳承下去（頁 127）。

對哲學進行「意義哲學」的改造，有三部分的工作。第一是方法學的探究，把哲學的基本概念化為純意義哲學的新概念。第二是哲學的現象學的描繪與比較哲學理想的工作。第三點接觸到哲學最核心的問題，哲學的終極目標是企圖去探測人生的本質及其自我實現的道途（頁 128-129）。意義哲學站在以往的哲學的基礎上，然而內容與性質大不相同。就第一點而言，是傳統知識論的繼承與改造。第二點是以傳統哲學為素材，相當程度上是新瓶裝舊酒。第三點則所追尋者為對人的終極真理與價值，而不是宇宙的終極實在。從這些特點可以預期，劉先生的探究會走上哲學史與文化哲學的研究。從第四、七章：「東西哲學的形而上學意境」、「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題目與內容，可知劉先生從哲學史取材，而尋求適應於當代的意義。於是形上學史不是終極真理的戰場，而是觀其意境，視之為人性的表徵，透過它以挖掘人類心靈本身內含的奧秘（頁 135）。各家形上學依時地的相近也有類似性，而可以進行文化特色的分類。劉先生論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一方面上承內聖外王的祈嚮，另一方面修正內容與擴大範圍，從中國傳統的偏向道德與政治解放出來，而包括人生各方面的能力與表現。五、六章：「文化歷史與真理」、「東西差異心態的比較與評價」，則研究文化差異與溝通的問題。劉先生基本觀點是文化基於人性，因此有差異又能互通。人性本質是相同的，但潛能開展有歧異。不同文明各自領受著不同的歷史教訓，傳承著不同的歷史創獲，由於「選擇的注意力」的差異，分別發揚了人性不同的潛能，以至構成了截然不同的幾種文化形態（頁 189）。

劉先生中年以後並沒有繼續構築意義哲學的體系，而是投入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的研究。但當他闡述自己的哲學見解時，其思路與概念可視為意義哲學的發展。姚才剛《終極信仰與多元價值的融通》用了三章的篇幅詳闡劉先生的理一分殊、兩行之理、哲學全觀的思想，錄其要旨於下：

劉述先對「理一分殊」做了一種創造性的詮釋，他不是僅僅局限於倫理道德或宇宙論的層面來理解，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種廣義的方法論原則（甚或被視為一項存在原則）。也就是說，超越的「理一」是貫通古今中外的，具有普遍性，但它的表現則依不同時空條件下的具體實際的情況而有所不同。故一方面求「歧異中的統一」或「多元中的一元」，另一方面也不能輕忽「理

一」在具體時空脈絡下的特殊表現，不抹煞「分殊」層面的差異。<sup>5</sup>

劉先生認為，「兩行」兼顧是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一方面，我們的終極關懷只能在「道」的層面，不能在「器」的層面。或者說，人的終極託付只能在創造性本身上，不能在創造的物品上。這恰好合於大《易》生生之旨、宋儒之不滯於迹的一貫精神。若把有限的「分殊」無限上綱，視為超越的「理一」，就必然會產生僵固。人永遠有超越的祈嚮，而不能停留於已有的成就之上。但另一方面，注重超越並不意味著輕忽現世，否則同樣會造成嚴重的偏失。天道是無限的，生生不已的，但具體落實到人，就成為有限的「分殊」。人須接受與生俱來的種種現實上的限制，努力發揮自己內在的潛質，不計成敗，而支撐人如此做的動力，是來自於對「道」的終極託付。人有了「道」的終極關懷，不再順軀殼起念，隨順當時的情況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乃可以嚮往聖賢乃至天地的境界。儒家是一種「內在超越」的思路。「超越與內在的兩行兼顧，使我有雙重認同，我既認同於超越的道，也認同於當下的我。我是有限的，道是無限的。道的創造結穴於我，而我的創造使我復於道的無窮。是在超越到內在、內在到超越的迴環之中，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sup>6</sup>。

一九八一年，劉先生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的就職演講，講題是〈系統哲學的探索〉。系統哲學所關懷的基本問題有兩個：（一）我們有沒有可能為這麼豐富雜多的世界人生的內容尋覓到一個共同的根源和基礎，然後才能逐漸分化成為不同的存在與價值的領域？（二）我們有沒有可能建構一個系統來涵蓋世界人生如此豐富雜多，乃至表現了深刻的、矛盾衝突的內容，把它們熔為一爐，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卻又井然有序，分別在這個系統之內得到它們適當的定位<sup>7</sup>？

### 三、意義哲學所含蘊的問題

理一分殊處理不同信仰、文化理想的溝通問題。兩行之理處理具體實踐與終極理想的問題。系統哲學則探討意義的來源、內容與體系。這些觀點在《新時代哲學

<sup>5</sup> 同前註，頁 114-115。

<sup>6</sup> 同前註，頁 186-187；引文為劉述先：《理想與現實的糾結》，頁 239。

<sup>7</sup> 姚才剛：《終極信仰與多元價值的融通》，頁 228。

的信念與方法》書中都有，這些後來發展是面對多元價值的世界，說明意義的複雜性與處理的原則。意義是複雜的，其中的歧異恐不下於「哲學」一詞。以下引述對劉先生有重要影響的田立克，對法西斯、納粹生命主義的批評。法西斯、納粹以生命主義之名攻擊大多數的西方傳統價值，田立克提出如下的辯駁。

人的生命力量不能離開「意向性」，即其與意義的關聯。意向性多強，生命力就有多強，因此人是萬物中最有生命力的。他能在任何方向中超越既與情境，這可能性使他能超越自己而創造。生命力是超越自己而不失去自己的創造力量，愈有超越自己的創造力，就愈有生命力。技術創造的世界，是人的生命最顯著的表現，也是無限地優於動物生命力之處。只有人有完全生命力，因為只有他有完全的意向性。意向性的定義是「朝向於有意義的內容」。人活在意義「裏面」，活在邏輯的、美感的、倫理的、宗教的效度中，他的主體性孕育於客體性之中。在他與實在的每個相遇中，自我與世界的結構都相互倚賴地出現。這事實最基本的表現是語言，給人從具體既與中進行抽象的力量，又從抽象回到具體既與中，對它進行詮釋與轉化。最有生命力的存有，是能用語言從既與束縛中解放的存有。人於其與實在的每次相遇中，皆超越了這個相遇。對於這個相遇，他理解、比較、嘗試其他可能性、以過去記憶預測將來。這是他的自由，而其生命的力量在這個自由，這是他的生命力的根源。……如果生命力與意向性的相關能正確理解的話，可以在有效範圍內接受勇敢的生物學詮釋。勇氣是生命力的功能之一，但生命力不能從人的存有整體分開，包括語言、創造力、精神生活、終極關懷。人的精神生活智性化的一個不幸結果是「精神」一詞消失，被心智、智性取代，於是「精神」中的生命力成分被分離而詮釋為獨立的生物力量。人被分成無血性的智力與無意義的生命力。中間立場即連結生命力與意向性的精神靈魂，被扔掉了。發展結果是化約的自然主義，從生物生命力導出自我肯定與勇氣<sup>8</sup>。

筆者對這段話的理解是，人與世界的相遇，不是以赤裸裸的主體，而是帶著他的意義去相遇，因此人有最大的生命力。意義的世界含藏在語言中，其中最容易看到的是科技的世界。意義世界包括語言、創造力、精神生活、終極關懷等等，但大多數人的理解恐怕止於語言與科技的創造。然而這部分的意義最容易成為主體用

<sup>8</sup> Paul Tillich, *The Courage to B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Reprint fr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81-83.



來侵犯與宰制世界的工具。必須承認的是，這是意義世界的一部分，也是最容易理解與接觸的部分，如果相對於包括語言、創造力、精神生活、終極關懷的全部意義世界，也許該稱此為意義世界的「邊見」，但我們不得不說，相較於意義世界的全體，邊見不僅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展現力量，比全義更具競爭力。

意義哲學是面對哲學危機的新途徑。哲學在二十世紀的危機，起於科學進步的衝擊，由於尋求宇宙人生終極真實的可能性受到懷疑，不得不改弦易轍，以不同的方法探求不同內容的終極真實。其實對終極實體的懷疑，早在啟蒙時代便已開始，而有所謂主體的轉向，二十世紀科學只是另一種衝擊，而有實證論的轉向、語言學的轉向等等。但不論把重心放在客體、主體、主客合一之體，甚至只是語言、文化，大部分的探究還是想獲得終極真實，只是這真實不再指超越的客觀實體而已。其實自有人類以來，如占星術、煉金術等，被歷史淘汰的學問何限，哲學如果擋不住科學的衝擊，也只得被淘汰。然而科學因為是對經驗世界分門別類的研究，在科學的根柢，與科學所不能及之處，作為全體之學的哲學仍然有廣大的空間。哲學的本質，即理性的、全體性的、詮釋性的學問，不論科學底哲學、文化哲學與意義哲學的存在理由皆在於此。因此我們可以說，科學的發展會改變哲學的方法與內容，但永遠無法取代哲學。

然而意義哲學的提法和科學哲學、文化哲學等仍有基本的差異，就是它的主要對象不是真實而是價值。劉先生所以提出意義哲學，我以為更多屬於中國哲學的傳統。漢學家葛瑞漢比較西方與先秦哲學時說，先秦哲學家的思考，是對於具有天之權威性的道德與政治秩序崩潰的反應。他們的基本問題不是西方哲學家的「甚麼是真理？」而是「何處是道？」——治理國家和引導生活的道<sup>9</sup>。劉先生的問題也是後一個，如果拿本書的幾種哲學來排列重要性，顯然是意義哲學在先，然後是文化哲學，最後是科學哲學。應該說，劉先生因為追尋意義而選擇哲學，進而思考哲學要如何發展，而不是先選擇了哲學行業，再為這行業尋找出路。

如前所述，意義哲學作為整體哲學，是依於智慧對於此岸的意義系絡做合理的抉擇與安排。於是意義哲學以古今中外的真理為內容，而加以安排改造。在《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中，劉先生已提出意義哲學的方法論，在其後幾章對東西形

<sup>9</sup> A.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89), p. 3.

而上學的意境、東西文化與真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討論，都是意義哲學方法論的運用。劉先生中年以後，在中國哲學具體研究上用了更多的工夫，除了朱子、黃梨洲的專著外，亦在於最後十幾年對儒學史的通觀之作。這些工作在內容的探討與整理上用了很多工夫，是他「詮釋！再詮釋！」呼喚的具體實踐。其成果不僅闡述了哲學史知識，而且提煉出能為當今世界帶來啟發的人生意義與價值。

但意義哲學除了以傳統哲學為素材，為各類的科學，各層級的生命活動進行定位，盡量包容多元價值外，更需要面對不同層次與立場如何協調與統一的問題。兼顧兩行，從分殊上升到理一，才是完整的「系統哲學」，然而統一的原則是甚麼，仍然有待研究。姚才剛說：「我覺得劉先生近年來放棄立一個精緻、完整的哲學系統的想法是明智的。當代西方解構主義已破除了對既定秩序、框架與法則的迷執，並對自古希臘以來形成的『邏各斯中心』的傳統提出挑戰，它昭示了非絕對化時代的來臨。如果再去構造一個自圓一致的哲學系統，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做法。」<sup>10</sup> 姚君的批評不太合拍，劉先生的理一是意義的根源與統一，並不是終極的客觀實體。然而追尋到底，意義的根源與統一是否得依靠客觀實體，或者雖非客觀實體而足以包容現有的價值？如果不追尋理一，會不會不能判斷與證成分殊的價值？理一又當如何去追尋？這些都是開放的問題。

#### 四、結語

劉先生的哲學可以用意義哲學作代表。這概念首見於《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他後來提出的系統哲學、理一分殊、兩行之理，都可以視為意義哲學方法論的發揮。意義哲學如果作為方法論，它自身很少有具體內容，而以古今中外哲學為其內容。它是探討文化與人生意義的哲學，有豐富的歷史性，把已有的哲學理論當作材料，探討對於當代的啟發。對於研究哲學史的學者，意義哲學可作為理論基礎。透過對哲學史的「詮釋再詮釋」，可以期望從分殊達到理一，至少是看到「具體的普遍性」的諸多可能性。不過就意義哲學本身來說，意義的終極根源是甚麼？如何容納最多的價值與意義？如何建立批判標準？還有許多待探討之處。意義哲學是劉先生留給我們的遺產，但仍然未完成的工作。

<sup>10</sup> 姚才剛：《終極信仰與多元價值的融通》，頁 235。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追憶劉述先先生

楊儒賓\*

臺灣新舊總統交接後半個月，民國新儒家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劉述先教授仙逝，享年八十二歲。我所以將劉先生仙逝日期與政權交接日期連結在一起，純粹是私人記憶的組合所致。因為就在新總統就職前一天的五月十九日，業師張亨先生告別人間。張老師言簡氣和，個性凝重，對我們這一輩學生的影響有在言說文字之外者。張老師一年來身體不佳，幾次進出臺大醫院。學生對張老師的健康狀況不忍想得太多，但心裏多有所準備。劉先生最近幾年的身體也不佳，苦於纏人的帕金森氏症。中研院文哲所的學術會議不少，我每進出文哲所，看到劉先生的身體日下，先是單眼失明，繼而肢體顫抖，言詞日澀，老病的人生苦相儼然現前。劉先生能在睡夢中安祥撒手，妻兒陪侍，雖然仍令人難以為懷，然對苦於軀體江河日下的病人而言，未嘗不是〈洪範〉所說的「考終命」。

劉先生是這一代重要的儒家研究學者，身為後學，我當然有較多的機會在會議場合向他請益。我們這一代的儒家關懷者或儒學研究者受益於新儒家前輩匪淺。民國六十三年(1974)我進入臺大，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先後蒞校講學，其授課內容於學術議題外，多有玄遠之理趣與家國之情懷，至今憶之，其講課神情猶可得其彷彿。劉先生為唐、牟兩先生後輩，其學問與生命大方向與兩先生接近。其早年著作如《文學欣賞的靈魂》、《生命情調的抉擇》及對卡西勒著作之翻譯及闡釋，更接近唐先生的路數，其啟蒙後學之功，似乎猶勝於他的中國哲學研究之著作。晚期劉先生對全球倫理及宗教對話多有撰述，與杜維明先生的努力，頗能桴鼓相應。儒家在當代，在學院，其展現方式自然不能不有別於前兩代的新儒家學者，這種轉向毋寧是合理的。而轉向有所得不能無所失，也可預期。儒學作為安身立命的學問，

---

\* 楊儒賓，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不能沒有訓練生命強度的要求，但當代的學院知識無與於身心之轉化，卻也清清楚楚。如何在知識與生命之間兩頭兼顧，一體打通，此時代留下的這篇作業甚難解答，但後來者還是要面對問題，嘗試解決的。

劉先生退休後，以先人的名義，在兩岸三地的高院設立獎學金，嘉惠後學。錢財是身外事，但也是宇宙內事，錢財是私產，但也是公義的載體。比起生死大事，錢財自是阿堵物之細末，但特多所謂的英雄豪傑，於此物偏多計較。劉先生設立這三個獎學金，精神與財力皆所費不貲，我相信這是他對親情，也是對儒學的承諾。猶記余英時先生大作《朱熹的歷史世界》出版，劉先生與他有過切磋，重點之一大概在於超越界與經驗界之關係。劉先生的質疑或許不合當代學界之時宜，卻是千年理學關心之所在。劉先生對理世界體證之深淺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別有深情，應當是可以肯定的。當余先生獲得克魯格獎的消息傳來時，劉先生喜不自勝，認為這是華人學術界之盛事。後來在另一場合，聽到杜維明先生談及此獲獎事，也是大加肯定。劉、杜兩先生與余先生同樣關注中華文化傳統，論道未必能合，面臨有益於整體華人文化發揚之事時，反應卻非常一致。老輩襟懷，典型堪式。處今之世，環顧左右，遂不能不更緬懷起劉先生來。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中國文哲研究所的守護者 ——敬悼劉述先先生

林月惠\*

六月六日中午，我正在廣州準備前去河源市參加陽明學會議，不料李明輝老師卻傳來劉述先先生驟歸道山的噩耗。當下驚訝，無法置信，隨即利用微信，將訊息轉發給大陸的師友，大家聞之莫不震驚哀慟。直至端午後返臺，我都猶如在夢中，難以接受劉先生就如此離去，一霎時湧上心頭的是：文哲所失去了一位大家長、守護者……。

語云：「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我常向人說：文哲所有劉先生天天守護著我們，何其有幸！然而，現在再也看不到劉先生在二樓公共空間閱報的身影，領受不到他參與學術會議的卓見與風采，再也感受不到他與我們談笑晏晏的幽默與風趣了。昨日我與寧波大學何靜老師前往仁愛醫院的簡易靈堂祭拜劉先生，靜靜地望著他微笑的照片，撫觸他厚重的眼鏡、他看過的書、用過的筆，內心無限哀思……，劉先生真的離我們遠去了！

我曾在年少之時閱讀過劉先生的《文學欣賞的靈魂》，但第一次真正見到劉先生，卻是在牟宗三先生講學臺灣師範大學時的浦城街寓所。約莫民國七十六年（1987），劉先生從香港前來探望牟先生，當天佣人請假，我就簡單準備午餐應急。只見兩位先生啃著饅頭，無視於粗茶淡飯，長談兩個多小時，欲罷不能。劉先生離去後，牟先生提及劉先生《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加以評論；又述及劉先生先嚴劉靜窗先生與熊十力先生的交往，以及劉先生從學於方東美先生、任教東海大學、留學南伊大的學思經歷，更讚賞劉安雲師母的俠女性格。隨後，牟先生以劉

---

\* 林月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先生為例，希望學生們若有機會，能出國深造，返本開新，以寬闊的學術視野與深刻的哲學反思，繼承並發揚中國哲學。那一個下午，我從牟先生的談興中，聽了許多劉先生的故事，印象深刻，頗有啟發。

再次真正接觸劉先生，已在我一九九八年任職文哲所之後，直到劉先生仙逝，共有十八年之久。在這期間，劉先生的為學與做人，我默而識之，暗自感佩，真是我們後輩學者的典範。劉先生雖是當代新儒家第三代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也是國際知名的學者，但卻平易近人，從不以大老自居，與我們同仁積極投入「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數十年來，帶領我們迎向國際學術界。然而，印象最深的是他數十年來如一日的「學術公務員」的鮮明形象，他讓我真正感受到「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堅持與莊嚴。劉先生常謙稱自嘲自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做他本分內的事。他每天幾乎風雨無阻地到文哲所「上班」，上午大約十點多，就可以發現他從中研院大門，緩緩地走向文哲所，進入他的研究室，伴隨著古典音樂，開始他一天的學術工作。通常在午餐前，我們大都可以在二樓的閱報區，看見他從容地瀏覽天下大事。在他還未罹患帕金森症氏之前，中午大多會與我們哲學方向的幾位同仁到餐廳午餐。餐敘時，劉先生或縱談學術之見，或評論時事，或耐心理解我們的想法，乃至不平則鳴的抱怨。在劉先生面前，我們可以侃侃而談，無須有任何心理負擔。或有困難，也能得到他的指點與開導。有時，有國內外學者來訪，我們會邀劉先生餐敘，他除了開心地與來訪學者暢談外，也常講許多學術界的趣聞軼事。我常想，應該為劉先生進行口述歷史，為他經過的時代，留下寶貴的見證。他每每堅持要與我們一起平均支付餐費，不能例外。午餐後，劉先生仍回到研究室，享受他的讀書之樂。直至五點下班時，我們還可以看到他駐足收發室，翻閱當天的晚報，才慢慢地踏著夕陽回家。十幾年來，只要我們到所裏，就可以看得到劉先生、找得到劉先生。他像是一位大家長，默默地守護我們，關心我們。在文哲所的成长與發展中，劉先生從不缺席。他似乎已經將文哲所的研究生活，當作一種生活方式，看似規律枯燥，他卻甘之如飴，堅持不懈，日積月累，這是現代版的「學不厭，教不倦」。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與生活方式，劉先生以身教，行之不渝。

由於劉先生天天到文哲所，所內的大小之事，每位同仁的學術能力之長短，他都了然於心，且多方鼓勵提攜。他教導我們的是開放的胸襟，避免門戶之見，多元的思維與批判，真誠的接納與包容。他以身作則，積極參與所內的各種會議或座談會，他總是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雖然劉先生是文哲所哲學

方向的諮詢委員，但舉凡經學、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等不同方向的同仁演講或學術會議，都可以看到劉先生的身影。他的臨在與到場，對於後輩如我們，就是最大的鼓勵。猶記得去年一位研究中俄文學的年輕同仁演講後，劉先生就告訴我，這位同仁的研究越做越好，進步很多。我很訝異，劉先生不僅關心哲學研究方向同仁的研究，只要是文哲所的成員，不論哪個研究方向，他都認真看待，默默關切，有容乃大。又如，他雖致力於當代新儒學的弘揚，但也欣賞思想史的研究，乃至各種研究進路的嘗試。一個月前，當吳汝鈞老師七十歲退休，舉辦學術座談會時，劉先生身體狀況已經不佳，步履緩慢，但他仍與會參加討論。此時，儘管劉先生說話不清楚，表達較為困難，但他卻以清晰的思路，表達他對吳老師諸多學術著作與造論的看法。這樣的學術真誠，令我動容。在學術面前，無論老少，人人平等，都有獨立自主的學術人格，都應得到尊重。而對於學術界的動態與新作，他總是在第一時間就能掌握，並積極回應。記得余英時先生出版《朱熹的歷史世界》後，他既肯定余先生的貢獻，也提出他個人的見解：迴環的必要。又，余先生出版《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後，我們還來不及通讀與消化，劉先生就先仔細閱讀，並分析余先生講「內向超越」與當代新儒家強調「內在超越」的異同。他以哲學的高度，敏銳的思維，常能一語中的指出關鍵問題所在，令人豁然開悟。此外，他對於兩岸三地儒學的發展，始終關切如一，心繫儒學的扎根與傳承。

前年，劉先生繼大陸武漢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設立獎學金之後，為鼓勵臺灣年輕學者研究，培育人才，並持續數十年來文哲所當代儒學的研究能量，他委由文哲所設置以其祖父為名的「紀念劉理堂先生博士論文獎」，同時也資助文哲所每年舉辦當代儒學論壇，殷切期盼中國哲學與當代新儒學研究慧命的相承相續。他以個人畢生的積蓄，紀念其祖父與雙親，長期嘉惠兩岸三地的學子。規劃之初，劉先生提及其祖父與雙親對他為學做人的影響，更提供一幀珍貴的家族大合照，讓我們看到年幼聰穎的劉先生，彌足珍貴。劉先生報本返始之情，慎終追遠之敬，澤及後輩之願，體現一位當代學者的儒者本懷。他立足傳統，正視現代；他學貫中西，既有本土的關懷，又有全球的視野。

這幾年來，劉先生的身體每下愈況，先是視網膜剝落，導致一隻眼睛幾乎失明；接著為帕金森氏症所苦，行動越來越不便。雖然如此，他仍堅持每天來文哲所。只是他的笑容少了，也不再與我們一起午餐了，不太說話了。他曾告訴我，一週要看四位醫生，真是折磨；他對自己身體健康的惡化，感到很無奈。幾個月前他

在文哲所前跌倒了，他慌張地要我們不要告訴師母，免得她擔心，但我們都覺得不忍與不捨，心中祈願他身體健康能好轉、能恢復。我在文哲所期間，參與過劉先生七秩、八秩壽慶的論文集編輯工作與學術研討會，猶記得李明輝老師在劉先生八秩壽慶的學術研討會上說：我們還要繼續慶祝劉先生九十歲的生日！當時，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流露學術界同道師友的共同祝願，此景歷歷，如在昨日。而今，就在端午節之前，劉先生驟然離開我們，不僅當代新儒家的代表性學者殞落了，學術界也失去一位卓越的學者，文哲所更失去一位與我們朝夕相處的大家長！

端午節過後，我致電劉師母，一起懷念劉老師。師母提及，劉老師辭世前夕，適逢二公子自美返臺，家人一起談心聊天，還踩腳踏車復健，心情不錯。隨後就寢，但清晨就發現他在睡夢中安然離去，未有病痛之苦。接著師母不捨地說，劉先生也許累了，身體的病痛，對於思路清晰，記憶力極佳的劉先生，反差極大。我惋惜劉先生還沒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劉靜窗先生文集》的出版，也還沒等到即將完成的《劉述先先生全集》的出版，真是遺憾。但師母反而安慰我說，這些編輯進度，劉先生都知道，也都放心了。誠如劉先生所說的：「生命完成於未完成之中！」師母特別欣賞劉先生這句話，我也有同感。這句以既濟為未濟的智慧箴言，不就是劉先生哲學探索與生命智慧的最佳註腳嗎？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憶劉述先老師

張崑將\*

六月七日從潘朝陽教授的 line 群組中聞知劉先生過世的消息，心中一震，儒門又失去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師。雖然我非劉先生的學生，也非哲學專業，但私淑已久；劉先生也因緣際會在我學術生涯中，常有關鍵性的影響，讓我見證到大師的風範。

第一次，是二〇〇二年我博士學位口考時，劉先生擔任我的口試委員，當時我的口考論文是《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劉先生從哲學與倫理學的專業，提供一些西方學者對於日本儒學研究的許多重要資料，先生希望提升我的研究能力，並與西方重要倫理學對話，開拓了我的研究視野，也對倫理學的比較研究開始關心起來。

第二次，是二〇〇三年我博士剛畢業，還在臺北醫學大學服務之際，曾邀請劉先生到學校來做「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專題講座，劉先生定題為〈從比較的視域看世界倫理與宗教對話：以東方智慧傳統為重點〉，為期兩週，每週一次。我因主持與聆聽了這兩次講座，開啟我對宗教對話與全球倫理議題的關注，並熟讀了劉先生《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一書。對於先生晚年致力於推動儒家倫理與全球宗教對話，深感這是人類迄今最棘手也最迫切的問題。這使我日後對儒家倫理如何與世界對話的思辨與哲理，有更深層的體會與學習，也使我在研究日本思想時，常會將日本式倫理與全球倫理作相對照；透過彼此比較，對日本式的特殊性倫理有更深層的把握與批判。

第三次，是二〇〇八年臺灣朱子學研究協會成立，劉先生擔任第一屆理事長，承蒙厚愛，我被選為祕書長，擔任實際執行的工作，才開始與劉先生有比較多的接

---

\* 張崑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觸。當時，每年都有朱子學的學術活動以及「朱子之路」，「朱子之路」是由楊儒賓老師帶領兩岸研究生前往踏尋朱子遺跡、書院、故居、墓地等活動。參加完「朱子之路」的研究生總能建立起兼具學術的與友誼的革命情感。我忝為實際執行者，也走了六、七次，確實受益良多。在前面幾年裏，每次參加活動，閩北人士及研究生都會問詢劉先生近況，我每次回來都親自到中研院拜訪劉先生，告知「朱子之路」及協會活動的種種，並攜回受委託帶回來要給劉先生的武夷山茶葉。劉先生往往溫和且靜靜地聽我道來，偶爾問些細節，關心研究生的學習狀況，我也會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收穫順便報告給劉先生。在那一刻裏，我有種感覺：我與劉先生的距離是很貼近的，這種貼近的感覺，是透過朱子學的關係。只要是學術上的學習與收穫，劉先生都很關注，也讓我對朱子學的研究與推廣有更堅定的使命感。

第四次，是二〇一三年由師大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潘朝陽教授、劉滄龍教授及我等人，為了「在臺重要漢學家的學思歷程」之計畫，特地到中研院文哲所專訪劉先生。我第一次聽到劉先生完整的學思歷程，從受父親啟蒙對哲學的興趣，到十五歲離開上海來臺灣，入成功中學寄宿同學家、考取臺大決定念哲學系開始，復至東海大學、美國南伊利諾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求學或任教，最後到臺灣退休；從卡西勒 (Cassirer) 的《人論》(An Essay on Man) 到湯瑪斯·孔恩 (Thomas S. Kuhn) 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從當代第二代新儒家方東美、牟宗三、徐復觀、錢穆先生，到第三代杜維明及劉先生本人的差別等等；從兩岸儒學發展到儒學民主化的課題；從「理一分殊」論儒學的現實性與理想性等等議題。先生如數家珍，侃侃而談，情理交融，中西通貫，道出畢生學思經歷。當時我們都沉浸在先生的學思世界裏，一下子竟過了近三個小時，意猶未盡。如今回憶，三年前的專訪歷歷在目，竟成空谷足音。當時充分感受到，先生任教所到之處，都能開風氣之先，壯大哲學領域。如在美國教書，可以讓外國人認識、愛好中國哲學；如在香港中文大學與臺灣任教，不知接引多少青年學子對哲學的愛好，孕育不少後學人才，堪稱兼具傳承與創新、融通中西哲學的典範者。

這個時代以儒為業的研究者多，而在言行實踐與人格上能被稱為儒家者少，劉先生堪稱當代純儒，實兼具「儒者」與「儒學研究者」兩角色，為後人樹立良好典範。我雖未曾上過劉先生一門課，但讀其書又能見其人，並能有以上四次榮幸與劉先生的接觸，已對我的學術生涯與儒學的使命感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哲人雖已矣，既使人心嚮往之，又令人想步學其人、其學，劉先生依然精神長存。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追憶劉述先老師

鄭宗義\*

執筆寫這篇文章時，劉述先老師已經離開了我們半年多。在去年六月二十日假臺北舉行的公祭及樹葬之後，九月十日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新亞書院在中大合辦了一場追思會，有過百位老師的舊友與學生出席，師母與幼子杰夫也在座，齊表哀思。當日的場面莊嚴肅穆，由我宣讀老師的行狀，並邀得金耀基、黃乃正、梁元生、關子尹、景海峰及文潔華致追思辭。我更將三十二篇紀念文字編成《劉述先先生紀念集》，在〈序〉中寫道：「這本小小的集子，其中的文章與相片，所述的人和事，都充滿了各位作者對先生的追憶與思念。倘若讀者展卷之餘，心有感通，想及自己與先生交往的種種片段，則一念化作百念、千念，先生的身影能長留大家心中，這本紀念集便算是功德完滿。」追思會的順利舉行和紀念集的刊印，讓我覺得自己總算是為老師的辭世做了些事，盡了點學生的責任。

回想起老師的教導，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給予學生的自由與信任。他從不給學生指定研究的問題，亦不要求學生接受他的看法，且更多時候是鼓勵學生將不同意他的地方充分發展出來。我一直要到自己帶研究生時，才真正明白老師教學的深意；這不只是通常說的自由學風，而是要訓練學生能獨立地發掘研究的題材，畢竟這是他們將來當學者所必須具備的能力。不過儘管如此，我跟老師讀博士時，卻很自然地追隨他的研究足跡。

我的博士論文《明清儒學轉型探析》是有啟於老師《黃宗羲心學的定位》一書。老師析論梨洲思想，是藉由梳理其中對蕺山的繼承、對陽明的簡擇及對朱子的批評，將之總括為梨洲四句表達一心萬殊的話，並指出蕺山、梨洲師徒思想中的內在一元論傾向，正是促成明清儒學轉型的重要因素。當時明清儒學的研究方興

---

\* 鄭宗義，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

未艾，我以為老師的洞見還可以更做深入探索，便決定以此為博士論文的題目。結果，我與老師的共同判定是，明清之際儒學經歷了一次典範的轉移，即從宋明儒的道德形上學變為清初的達情遂欲哲學。我的論文則以王學的蕩越與救正、反宋明儒思潮的出現等，來解釋內在一元論傾向的形成。其後，我的研究興趣與方向雖已不限於此，但藕斷絲連，又讓我發現，達情遂欲哲學竟有自王門泰州學派轉手而出的線索，而多番重讀戴東原的《孟子字義疏證》亦讓我修正了對東原哲學的理解和評價。這一切像是在尋找拼圖的經驗，其實一直延續至今，前些日子我寫就〈論明清之際儒學的一元化傾向〉一文，自信已將內在一元論傾向的來龍去脈徹底弄清楚，彷彿多年來終於找到了最後的一塊拼圖，心中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感覺，學問的甘苦於焉可見。

可以告慰老師的是，我在這篇文章中代他回應了一些他已經無法親身答覆的質疑和批評。事緣過去幾年間，學界出現一股推重元氣論的思潮，有論者本此提出戴山、梨洲的思想都屬於元氣論，甚至已逸出陽明心學的藩籬，由是乃批評老師的詮釋不當。老師在二〇一二年中央研究院舉辦的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上發表〈黃宗羲心學的定位重探〉，文末談及對他的批評意見，但卻只以意見「尚待闡發」，「仍維持我自己一貫的觀點」做覆。我的文章指出，老師確實是因受到牟宗三對理氣關係的判定的影響，而亦像牟先生一樣，有意無意地忽略元氣論，這雖在詮釋上或有不夠體貼之處，但他認定戴山、梨洲皆表現出內在一元論的傾向，一轉手而成儒學的新典範，則是個未易動搖的精確判斷。這是因為若把理緊吸、內收於氣，無論是否將氣上提至超越的元氣，理對氣的超越義、規範義必定大大減殺，而為清初之擯棄形上世界埋下伏筆。

老師對我的啟發與影響不只是在明清儒學的領域，這裏就不一一細表。正因我追隨過老師的思想，所以也一直在想應如何恰當地定位他的學術貢獻，特別是在當代新儒家（臺港新儒家）的學脈之中。扼要來說，在二十世紀發展形成的當代新儒家，其中心課題有三：一是文化哲學的探索；一是中國形而上學的重建；一是儒家與民主政治的思考，而老師在前兩個課題上都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先說文化哲學的探索。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傳統中國文化面對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文化的衝擊（所謂三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而逐步失序解體，遂迫使學人必須仔細去省察「文化」的觀念，以求說明中國文化現在的處境，並指示其未來的走向。於是，有梁漱溟西、中、印文化三支演進說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有新儒家一九五八年的

〈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有唐君毅以道德理性為各種文化表現的精神根據的《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及《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並且在八十年代後還延續為儒家文明與東亞經濟、文明的衝突與對話、全球一體化與地域性知識等議題的探討。正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老師年輕時即發願要深入了解西方各家的文化哲學，求知己知彼。我曾提醒大家重新注意他這時期的力作《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當中通過揉合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符號形式哲學(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及凱塞林(Hermann Keyserling)「意義哲學」的觀念(the philosophy of significance or meaning)來一方面解釋文化中不同的意義表達及其形式，另一方面申明「意義」本身才是哲學思考起點，實可謂別出心裁。尤有甚者，書中提出「創造的創造性」來由文化回歸生命，並接上中國哲學的「本心」；提出「理一分殊」(或「異質的和諧性」)來消解文化中不同的意義表達及其形式所可能造成的衝突矛盾，都有更作擴充發揮的理論潛力。事實上，老師後來再運用「理一分殊」的觀念來為現代文化尋求一條不落於絕對主義或相對主義兩邊的中道，並積極參與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的思想運動，即是明證。

再說中國形而上學的重建。上世紀二十年代，新儒家學者為求在科學主義與西方哲學去形而上學轉向知識論的強大挑戰下證成儒學(特別是其中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勝義與價值，自熊十力《新唯識論》以來，便展開了一項重建中國形而上學的思想工程。熊著劈頭即宣告西方哲學於本體的探究自始就誤入歧途，因為本體「非是離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識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實證相應故」；其進而分別量智與性智(或曰科學真理與玄學真理)，以前者屬知識領域，後者屬實證境界，兩者不應混漫，可以說是擘畫了一個宏大的哲學計畫(philosophy project)以供後來者續做演繹補充。而熊先生的兩位高足，唐君毅與牟宗三所各自創建的思想體系，正是他們向乃師提交的答卷。唐著《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中前五境是知識論(及相應的人生哲學)，第六境是由理論過渡至實踐的道德哲學，後三境是即道德即宗教的證悟境界，同樣劃分開知識與實證，並卒以儒家的天德流行境為最高鵠的。牟著《現象與物自身》依本心開出無執的存有論(或曰本體界的存有論)，依本心之自我坎陷為識心，開出執的存有論(或曰現象界的存有論)，又以無執的存有論包含道德的形上學，亦是區別了知識與實證，並終判儒家為大中至正的圓教。從這條思想發展的線索看，則老師雖未再創一套形而上學，但他奏起的三部曲：理一分殊、兩行之理、及迴環的必要性，仍是繼往開來的力作。老師對熊、唐、牟的偉構基本

上是肯定的，然而他更關注這套智慧如何在現代多元的文化氛圍下做更好更有力的表述，所以他要追問智慧（或真理）的表現方式為何？他的回答是理一分殊，即智慧是一，但其表現必是多；而再下來就是怎樣於認識一即多之外又肯定多即一，所謂兩行之理，及在兩行間往復迴環的實踐之道。老師深信，唯有以其三部曲的方式來表現，儒家的形上智慧才能免於絕對主義的嫌疑，且能與不同的精神傳統互動，以求做出一己的貢獻。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上面我將老師的思想置於當代新儒家的學脈中所做的理解與定位，只是一己的嘗試，現在也已無法獲得老師的印可。不過，若想到詮釋必屬多元、詮釋即是創新，則我更希望以後有志於研究老師學問的人，能提出更多不盡相同的閱讀，因這是作為學生、作為研究者的責任。

謹以此文追憶敬愛的劉述先老師。

2017年1月25日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懷念述先師

陳榮開\*

六月六日接到哲學系鄭宗義兄的電郵，驚悉述先師仙逝，隨即與宗義兄聯繫，以瞭解詳情，然後致電師母，表示深切慰問。

回想初識述先師，是在大學三年級（一九七九—八〇）選修他的「宋明理學」之時。當時的述先師雖已貴為哲學系的系主任，衣履卻甚素樸。他教學認真，態度嚴肅，而且不苟言笑。然而，每當談到緊要之處，他又興致勃勃，議論風生。本來跟他潛心修習身心性命之學，必有所得；卻因一方面自己學校的活動太多，另一方面又不慣於抽象思維，非但對理氣性情等觀念感到難於掌握，且也不大聽懂述先師對宋明理學「牛毛繭絲」的細緻剖析。因此，一整年下來，學得並不太好，成績也很普通。

差不多要到一九八七年廈門大學「第二屆國際朱子學會議」之後，方才與述先師有較頻繁地接觸和深入地瞭解。那次，述先師從中大前去，同行的還有系內同事王煜與馮耀明兩教授，而我則陪同廣島大學中國哲學系的佐藤仁教授，自日本出席。會上除了多有機會向述先師請益，也因為自己要報告，並且充當佐藤教授的即時傳譯之故，開始得到述先師的注意。會後在返回廣島途中，與佐藤教授短暫留港，就在其間的一個晚上，安排了佐藤教授與述先師的餐敘。聚會假述先師常去的尖沙咀大上海飯店舉行，由我來做翻譯，兩教授自一九八二年夏威夷「第一屆國際朱子學會議」闊別，至此乃得一敘，固然相談甚歡，而我在一旁傾聽，從中也學到不少，真可謂既愉快又充實的一晚。

之後，離港之際，又專程往述先師新亞的辦公室道別。述先師親切地領我去雲起軒吃牛肉麵，言談之間，還詢及我下一階段的升學計畫。當他知道我有意前往

---

\* 陳榮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北美繼續深造，便毫不猶豫地說要為我大力引薦。殊不知，我未能體會前輩提攜後學的苦心，反而自以為坦率，竟對他說自己已有心儀的教授與去處，婉謝了他的雅意。

儘管如此，述先師對我的關懷並未因此而間斷。還記得，我去多倫多之後的一兩年間，寫了篇有關儒家的出處進退的長文，寄呈述先師，請他教正。不久，便收到他長信一通，除了詳細評論了我的文章，還透露出對學生旅客在外的甚深眷念。展卷之餘，我深為感激，而且滿心溫暖。

對於學生在學術上的發展，述先師尤表關注。當我正在考慮博士論文的研究範圍時，他建議我多多聽取杜維明教授的意見，繼續中日儒學的比較研究。其理由是杜教授對學界的發展有敏銳的觸覺。畢業回港就職之後，他又為我推薦，參與中研院文哲所東亞儒學的研究計畫；儘管基於先後主次的考慮，自己的研究至今仍以朱子學為重點。

至於朱子學的研究，除了在觀點上與述先師不盡相同之外，也由於過分集中於《中庸》，一度為老師所曉諭。然而，去年夏天訪問文哲所期間，在林月惠教授主持下，我做了次有關朱子《中庸章句》第二十三章的學術報告，述先師雖已行動不便，也特地前來垂聽。除了提出了非常寶貴而且切實有用的意見之外，最令我鼓舞的是，對於我一直以來所從事的工作，他終於做出了肯定，並且表示欣賞。當日他所下的評語已然無法盡記，大意卻為：朱子沒後七百多年至今，竟仍有人如此認真細緻地對待他的注解，他泉下有知，必也深感欣慰。得到老師的首肯若此，怎不教人欣喜？

其實我那天所做的報告，原為響應述先師八十華誕論文集的編輯而撰寫，只恨遲遲未及完成，以致錯過梓期，無緣收在論集之內。為此雖已鄭重向述先師致歉，並蒙他的諒解，心裏仍然很感不安。後來乃決定將原文發展為一專論，準備完成之日再行呈獻，以報老師學恩於萬一。豈料尚未竣工，述先師便遽歸道山！人生的遺憾，莫此之甚！

三十多年的隨師問學，自覺述先師與師母已非僅以學生視我。十年前遼耀東師逝世，我們一班香港學生為他在新亞舉辦追思，述先師慨然答允為典禮致詞；去歲遼師母在臺北身故，劉師母又親臨告別。當然，述先師、師母與耀東師、師母素有交誼。然而，他們的蒞臨參與確實使我更感親近。每次我們去臺北，一家大小都必然到述先師及師母府上拜望，而他們也必親切地予以歡迎，並且招待上館子吃飯，



即使去年暑假述先師帕金森的症狀已然加劇，也都照舊如儀。也許因為儒學教養的影響，對於學生，述先師每每表現出一派的師道尊嚴。然而，有時怕他跌倒，不禁上前攙扶，卻必為他所拒。唯一例外的是，當我的兩個小女兒拖著他的手，無論走在飯店之內、商場之間，抑或在研究院的路上，他都欣然接納。也許述先師那時在想：他並非受人照顧，而是照顧兩名孫女兒的「劉爺爺」。

誠如師母電話中所言，述先師已經完成一切他要完成的工作，即在睡夢中安詳過世。大去前一天，次子又適從美國回來，陪他走完人生最後一段的路，似已再無遺憾。然而，他溘然長逝，生者何堪，又豈無傷痛！此在師母而言，尤見其然；儘管她素以達觀理性、獨立自主見稱。但願師母節哀順變，善加珍重，在今後的日子裏，繼續活出她豐盛有意義的人生！

此時此刻，縈繞腦際的是述先師在研究院大道上踽踽獨行的身影。他以八十過外的高齡，身患帕金森重症，且已一目不能見物，卻從不須人照顧，每天堅持前往研究室讀書寫作。雖然老師謙稱，他不過「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卻正正這種「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精神與毅力，最為後學晚生所難能。但願自己終能如此，以延續述先師的薪傳。

（本文原刊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6月13日；後刊於《鵝湖》第492期〔2016年6月〕；2016年7月11日修訂）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u Shu-hsien (劉述先)

Yiu-ming Fung (馮耀明)\*

In sum, a Confucian follower fully realizes that we are all finite human beings, striving to work out the great potentiality given us as an endowment from Heaven. We are in the area of diversity (*fenshu*), but we aim at unity (*liyi*) as our regulative idea. In a world full of conflicts and evils, our goal is creative creativity (*shengsheng*) and comprehensive harmony (*hexie*). Is this not an impossible goal? We must follow the example of Confucius who is said to be “one who keeps working towards a goal the realization of which he knows to be hopeless.”—Shu-hsien Liu, “Reflections on Globalization from a Neo-Confucian Perspective” (JCP 38:1 [March 2011]: 116)

In the afternoon of 4<sup>th</sup> June 2016, my wife and I had visited Professor Liu Shu-hsien (劉述先) and his wife in their Taipei residence for saying farewell before we came back to Hong Kong in summer. One of the topics we chatted was about the legend of the lady who was loved by both Liang Sicheng (梁思成) and Jin Yuelin (金岳霖), two great scholars and famous intellectuals in the last century. We all forgot the lady’s name even though we tried to take few minutes to recall. But Professor Liu suddenly said: “She is Lin Huiyin (林徽因).” As I remember, this is one of the several occasions that Professor Liu gave me an impression of his quick response with clear mind. So, I was shocked and very sad to

---

\* 馮耀明，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

hear that Professor Liu passed away in the morning of 6<sup>th</sup> June 2016, two days after our meeting.

The first time I met Professor Liu was in 1974 when I studied my MPhil degree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I th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came to Hong Kong for teaching and I was fortunate to be the first student supervised by him. As I know, Confucianism,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comparative religious philosophy were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and achievements at that time. I took his course on metaphysics in which he sometimes criticized some major analytic philosophers' view of anti-metaphysics. Since my thesis was about normative ethics and analytical ethics with emphasis on the approach of analytic philosophy, it seems that he might not agree with me to use analytic method to deal with both Confucian ethics and Kantian ethics. Nevertheless, he not only gave me some very significant and insightful suggestions to revise the draft of my thesis, but also expressed his tolerance to some of my niggling points of view. In my memory, he always held his own principle very firmly and never gave up his own view without good reasons, on the one hand, but he also tried to tolerate views with different approach from his own, on the other. In this regard, I deeply felt that he was really open-minded.

In 1984, Professor Liu recommended me to go to Singapore to be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when I graduated from CUHK with a PhD degree. Later, I was fortunate to have a chance to come back to Hong Kong for joining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CUHK. In the following years I was working in the Department under his leadership and had deep experience that he wa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 educator but also a capable academic administrator. He always respected the academic freedom of our colleagues. Each faculty member was entitled to manage his syllabus and teaching content without being interfered. Even the academic program was required to shift from four years to three years, he was capable to minimize the substantial change in the old well-organized curriculum, i.e., to keep the old wine in the new bottle.

As we know, Professor Liu has strong faith in Confucianism and is one of the great scholars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His publications from Zhu Xi (朱熹) to Huang Zongxi (黃宗羲), from cultural philosophy to global ethics,

and from Chinese philosophy to Comparative religion, are well-known as the first-rate philosophical works with originality and great impact in these fields. Here,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one thing which may indicate that his idea of “*li-yi fen-shu*” (理一分殊 one principle with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which is a reconstruction of Zhu Xi’s old idea, is well-received in the field. For example, Professor Liu’s idea of “*li-yi*,” as interpreted by Michael P. Levine in his *Pantheism: A Non-theistic Concept of De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is not an entity, but an all-encompassing creative power or principle which makes things created. Although Confucian idea of “*li-yi*” is not identical with “God” in terms of Levine’s pantheist metaphysics, according to Levine, both cannot be identified as merely an immanent cause of things, but as a creative power or principle. So, under this framework, these tw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ltimate concern of the world can be understood as “one principle with two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Besides, with this framework, we may have a common ground to make an inclusive rather than exclusive dialogue i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different mor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This framework, I think, is definitely better than that of Karl Jaspers’ idea of “the breakthrough of transcendence” in the so-called “axial age.” I think this also reflects Professor Liu’s open-mindedness in his project of global ethics.

I must confess that I am not a follower of Professor Liu’s philosophy. However, I appreciate very much his hard-working in promoting Confucian wisdom and faith in terms of its significance and relevance to modern world. Moreover, his metaphysical idea is interesting and provocative in enlarging the horizon and deepening the depth of our thinking. I think many scholars of my generation and the young one have benefited from learning his philosophical works, no matter they agree or disagree with his views.

Professor Liu contributed his whole life to teaching and research. As one of his students, I feel that I owe him a great debt of gratitude for his enthusiastic and tireless teaching; as one of the readers of his works, I also feel that I have been benefited from his insightful and provocative thought. Now, we lost a great thinker and educator. But he will be remembered forever.

Thank you to Professor Liu Shu-hsien, our unforgettable teacher!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有原則的人——敬悼劉述先先生

陳少明<sup>\*</sup>

六月六號，我們正在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做學術交流，從一則來自廣州同事的短信上，得知劉述先先生辭世的消息。在此幾天前，蘭芬還問我，近期能否找機會再請劉先生到我們中大做報告。我知道，這種機會自然是越來越少，但還是沒想到，至此機會就變成了零。

知道劉先生的學問是在上世紀八〇年代，不過，不是從當時海內外名家雲集的中國文化書院。中國文化書院在北京，我讀書的中山大學在廣州。在我們哲學系中國近現代哲學史研究室的資料室中，我無意中翻閱到劉先生簽題贈送給研究室的幾本書。其中我依稀記得起書名的，有《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和《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後者好像是介紹史賓格勒、卡西勒思想的，主題為文化哲學，這正是那個時代的顯學。這大概是我最早讀到的海外新儒家的著述。後來我才知道，那時劉先生為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贈書的因緣與中山大學和中文大學兩個哲學系最初的交流有關。而這項交流今天仍以「粵港中大哲學論壇」的名義繼續在發展。不久前，鄭宗義教授還和我們擬議新一期論壇的事宜。

我對劉先生的瞭解有一個過程。起初注意他的著述，除專業作品外，也有對大陸政治文化現象的評論。記得有一次，看到他對馮友蘭先生的評論，對其品格有苛責之詞，心裏很不以為然。依自己成長的背景理解，會認為馮先生在五〇年代以後，尤其是文革期間，某些事後看來可說是「政治不正確」的舉動，多係嚴酷環境中的自我保護行為。雖然不值辯解，但可以諒解。有時候，我們也會議論這種由歷史造成的海內外學者之間相互隔膜的現象。後來，李蘭芬到臺灣參加學術會議，剛好有機會向劉先生請教，就直接向他提及相關問題。沒想到，劉先生坦然承認他對

---

\* 陳少明，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大陸特定背景的殘酷性瞭解不夠，並以他早期在臺灣求學時白色恐怖氣氛的現象為例，說明極限狀態下的行為，不能用常理要求。我聽了蘭芬的轉述後，對他頓生好感。

還有另外一件小事，加深我對他的認識。九〇年代後期，我有一個碩士研究生，想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學位。我應她的要求，填了一份推薦表給中文大學哲學系。沒想到，不久之後我收到劉先生的來信。信中表示因為計畫的限制，哲學系沒法接受該生。但他覺得學生素質不錯，把她推薦給宗教系。接信很突然，因為我的推薦信只是形式性的，並非直接寫給他本人。當時，我作為一名普通青年教師，壓根就沒資格向他寫推薦信。收到他的回信時，真的非常感動。

雖然此後各種學術會議上，都常有見到劉先生的機會，但真正跟他直接接觸的經驗，還是幾年前他到我們學校做演講的時候。那是中山大學剛建博雅學院時，甘陽教授請了很多大家來做講演，劉先生也是其中一位。我們哲學系搭便車，也請劉先生做報告。題目是關於現代新儒學發展線索與分期的討論。反應很熱烈。而且，蘭芬和我還有機會，陪同劉先生和劉太太，一起到陽江參觀廣東水下考古的重要成果——已經打撈出水的「南海一號」沉船。他們一路上興致勃勃，談笑不斷。此後，因李明輝教授課題合作的關係，我們有較多機會訪問臺北中央研究院。劉先生幾乎都到場跟我們見面。李蘭芬因為宗教哲學的教學，就世界倫理問題向他請益尤多。他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個有原則的人。

劉先生雖以儒家為立場，但其治學視野廣闊，中西兼顧，且富於現實感。其對「理一分殊」的重新闡釋，深化世界倫理認識的觀點，在我看來，尤為重要。在全球化過程中，各種矛盾的激化，導致普遍與特殊的衝突重新進入新的哲學視野。不但特殊與特殊衝突，普遍與特殊衝突，而且更多的是打著普遍主義旗號的各種特殊立場的衝突。因此，如何維護或發展一種和而不同的局面，劉先生的哲學思考深入而富於啟發性。思想是永恆的事業，這不僅表示，思想關懷的對象可以跨越時空的限制，同時也意味著它是需要代際交接發展的工作。因此，紀念先行者及其成就，正是激勵自己與同道繼續努力的一個機會。應編者之邀，我謹以此文，悼念尊敬的前輩劉述先先生。

2016年8月3日

於中山大學廣州珠江南岸校區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紀念劉述先先生

陳立勝\*

今年六月上旬，我正跟陳少明教授等中山大學禪宗與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同仁參加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舉辦的「宗教多重歸屬」(Multiple Religious Belonging: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from East and West)的一個學術研討會。突然接到林月惠教授的微信，告知劉先生遽歸道山，一時頗感愕然。我當時在會上的發言題目(“Way” and “Paths”: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on Multiple Religious Belonging with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正跟先生多年宣導的「理一分殊」宗教哲學相關。今年七月，陳瑋芬教授致函於我，囑我以「故舊」或「門人」的身分寫一點文字紀念先生。我非先生的門人，作為晚輩，也不敢稱是先生的故舊。本欲婉辭，但自忖十多年前認識先生，而在認識先生之前，我亦通讀過先生的大部分著述，對先生的思想雖不敢稱「熟」，但也不算「陌生」。先生其人、其思於我自是「故舊」，先生對朱子與陽明的慧識、對「理一分殊」之舊義新發，啟迪我良多，先生於我亦自是老師，焉有推辭之理？

猶記二〇〇一年秋，我應臺灣大學黃俊傑先生（時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的邀請，參加「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學術研討會」。在我做完〈朱子讀書法：詮釋與詮釋之外〉報告之後，一問者發言，聲若洪鐘，寥寥幾句，點到要害，我循聲而視，只見一長者兩眼炯炯有神，真有溫而厲的氣象。我悄聲問身邊的導師馮達文先生，方知問者即是當代新儒家之巨擘劉述先先生。

後來，敝校博雅學院甘陽院長邀請先生來中大講學，跟先生面談的機會遂多，記得一次席間有友反覆談論某一話題，先生面有不豫之色，後徑打斷話題，一旁的劉師母快言快語說：「我家老劉，就這脾氣，很難討人喜歡。」並馬上轉移話題，

---

\* 陳立勝，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說她自己最討人喜歡；當初劉先生跟牟宗三先生問學，牟先生最喜歡的是她這個門外弟子，而非劉先生本人。一席人哄堂大笑，惟先生一邊點頭，一邊微笑，應該算是默認吧！

二〇一〇年秋，我應鍾彩鈞與李明輝兩位先生的邀請，擔任中研院文哲所特邀訪問學人，並就〈怒觀、治怒與不動心：儒學與斯多亞主義修身學的一個比較〉議題發表演講，一到會議室，發現先生早已安坐在那裏閉目養神。先生將其新著《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面贈給我，並說我的《王陽明「萬物一體」論》寫得不錯，我知道這是先生獎掖後學的套語，但心中也自竊喜一番。我在報告之中指出，斯多亞修身思想在明代中晚期即由利瑪竇傳入中國，其所著《二十五言》實採自愛比克泰德，四庫館臣甚至認為，這是「西洋教法」傳入中國的第一部著作。而斯多亞修身思想尤其治怒思想，跟儒家思想頗可相互發明。先生當即指出，基督教神學尤其是保羅書信之中，即有很多斯多亞的術語與思想，西方某某學者對此研究甚詳。當時先生已顯老態，然記憶力如此之好，實讓人欽佩。中研院地處南港，濕氣很重，院中小徑濕滑，先生走路頗有些艱難。席間先生談興不減，倘不是林月惠教授不時地給他夾菜，他幾乎沒吃多少東西。餐後目送先生，蹣跚獨行的背影逐漸消失在遠處，心中悵然若失。

是年冬天，我到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參加彭國翔兄主持的「明清之際的精神與思想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在勺園早餐，不期而見先生獨坐於餐廳一角，布袍蕭索，青鬢如絲，然龍馬精神未減。時先生應邀擔任蔡元培學術講座與湯用彤學術講座，主講〈理一分殊與全球地域化〉和〈論超越與內在的迴環〉，當時我因會議排程，無法抽身親聆教音，誠為遺憾。

先生學貫中西，一生筆耕不輟，著述豐碩。早有文化哲學之宏大建構，以為生命求意義，為文化尋出路；其中有朱子哲學、黃宗羲心學研究等煌煌巨作，儒學終成先生安身立命之處。晚則究心於儒家宗教性及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通過「超越內在」說揭示儒家之宗教性與中道性質，通過程朱理學「理一分殊」的新釋，使儒學能夠更好地融於現代，並對現代性做出更加有力的回應。

從先生一生的學思歷程，分明讓人看到當年理學家的人生軌跡：早則出入佛老，晚則返本開新。只是在先生這裏，西方哲學與基督神學是新時代的「佛老」，而與理學家之開新相比，先生之開新則是在古今中西張力之中，為儒家由傳統走向現代尋獲一條路徑。於是，在程朱那裏，「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而在先

生這裏，「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為求「古今中西」之「貫通」，先生把「理一」往上拉到「道可道，非常道」的「無言之境」、拉到「道大無外」之境，成為「超越」特定文化形態、特定宗教傳統的田立克 (Paul Tillich) 所謂的「超越上帝的上帝」(God above God)、希克 (John Hick) 所謂的實體 (the Real)，特定的文化形態、特定的宗教都是「分殊」。於是，在程朱那裏，本是要別兼愛、辟佛老、強調儒家認同的命題；在先生這裏，成為通中西、貫古今的宗教對話命題。在程朱那裏，儒者的使命是在「中國」安頓儒學；在先生這裏，儒者的使命是在「世界」之中安頓中國儒學。

實際上，在「理一」與「分殊」的意涵與側重點上，先生對程朱理學之挪騰、轉換與王陽明心學一系心同理同、道一無二的文化觀、宗教觀若合符節：道一而已矣，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釋」見之謂之釋，「老」見之謂之老，「儒」見之謂之儒。才有所見，便有所偏。「道」即先生「理一」之謂，「偏」即先生「分殊」之謂。「偏」本是天理之創造性、文化之創造性之體現，文化精神總是凝結與體現於一具體的歷史性、一具體的文化傳統之中，此是存有論上的「偏」。意識到此「偏」即已「不偏」（「分殊」一旦獲得自覺，「理一」的意識即相伴而起，陽明說「文王望道未之見」是真見道語），此時不偏，反倒是偏（對存有論上的「偏」無自覺，就難免以「理一」自居，而流於坐井觀天）。質言之，「道」是普世的 (global)，「偏」是地域的 (local)。這個普世的大道總是在不同的時空地域之中存有、活動與體現（於「偏」中見出），同時又總不會被某個具體的時空地域所限制，是謂「超越而內在」，是謂「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只是在王陽明那裏，他用徹上徹下，無物不具的「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聖學之全」去克服「自小其道」的文化偏狹心態，洋溢著的是「道在茲矣」之自信。而在先生這裏，則用「理一分殊」去克服來自任何傳統的「判教」心態（在這一點上，先生與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確實有別，唐、牟更接近於陽明之路數），「多元互濟」的願景與先生早年為文化尋出路的理想，可謂遙相呼應。

哲人萎矣，然而，儒家有顏子「死而不歿」之說，羅近溪曾對其門人說：「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之，……全是他造化好，卻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

說，眼便皆是替他看，而耳便皆是替他聽，……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是的，為先生「續命」，接續先生的「使命」，在「理一」（普世價值、普世大道）與「分殊」（文化與歷史之傳統）的辨證互動之中，在向「理一」的追求之中，深潛於本己所屬的「分殊」，「掘地及泉」，與異己之「分殊」相通、相融，進而創造出新的「分殊」，或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此又不惟先生之故舊及門人之「職分」也（依陳榮捷先生，「理一分殊」之「分」非「分別」之「分」，乃「職分」之「分」，實則「分殊」所在，亦「職分」所在），以儒學為志業者敢不勉哉！

## ※ 劉述先教授紀念專輯 ※

# 懷念劉述先先生

彭國翔\*

六月六日中午，突然收到學生傳來劉述先先生去世的消息，極為震驚。我知道這些年劉先生因眼疾術後的影響，衰老得很快，又聽說他患了帕金森氏症。但三年前，我們在臺北中研院文哲所見面，他雖然步履蹣跚，精神心態卻都不錯。我告辭時他還堅持要送我到電梯門口。因此，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實在難以相信，立刻電話詢問學生消息的來源。當得知來自文哲所的林月惠女士時，心中仍不願相信，又再次給李明輝教授去了資訊，詢問情況。直到晚上得到回覆，確實無疑，我才終於接受了這個事實。回想與劉先生多年來的交誼，不免悲從中來。由於次日一早我即須由上海趕赴歐洲，參加歐洲中國哲學學會的首屆年會，無法立即撰寫紀念文字，但十幾個小時的途中以及這幾天的會議期間，劉先生的音容笑貌，特別是與我的一些往來，不斷浮上我的心頭。感傷之念，迄今不能自己。

我和劉先生的聯繫，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即已開始。由於我大學時代便已廣泛閱讀了海外華人人文學者的著作，一度萌生了向這些前輩先生求學的想法。當時我的興趣並不在於出國，而只是希望能夠更為方便、大量地閱讀到海外尤其是包括劉先生在內的華人前輩學者的著作（當時閱讀海外出版的著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直接向他們請益，而香港又是最近大陸的地方，所以，我大四時曾經致函劉先生，詢問跟他學習的可能性。劉先生很快給我回了信。可惜當時香港似乎尚無招收大陸學生的先例，加之劉先生也退休在即。我只有一腔讀書的熱情，對於如何申請、辦理各種相關手續，一無所知，更不耐煩，於是就打消了去跟劉先生學習的念頭。

二〇〇〇年三至六月，由於臺灣陸委會中華發展基金會的支持，我到臺北訪問

---

\* 彭國翔，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求是特聘教授。

四個月。那時劉先生已經由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到臺北的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擔任特聘研究員。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在文哲所三樓他的研究室裏。初次見面，劉先生給我的感覺是比較冷峻，話語不多，「望之儼然」。但是，後來交往久了，我慢慢瞭解到他「即之也溫」的一面。有的人初次見面即會給人以「平易近人」之感，但相處再久，他也始終把自己包裹得很好，讓你無法瞭解他真實的內心世界。如此的「平易近人」，恐怕只是與人保持距離，而並不以真面目示人的策略而已。另有一類人，剛開始接觸未必會讓人覺得平易近人，有些甚至會讓人感覺高傲；但這種人往往真誠而無機心，久而久之，志同道合的話，很可能會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劉先生顯然是後一種人。

當然，那次赴臺之前，在我就讀北大研究生期間，我與劉先生一直保持書信往來。記得有一年，余英時先生發表長文力辨「錢穆與新儒家」，劉先生即把他尚未發表的回應文字寄給我，文章前半部分還是他手寫文稿的影印件。我雖然到二〇〇〇年才在臺北得遇余英時先生，但對余先生區分錢先生與「新儒家」這一名號的用意，心中是有所感知的。這一點，二〇〇四年在普林斯頓的一次和余先生晚飯後步行的交談中，得到了印證。如果說，在認同儒家傳統一貫的價值取向這個意義上，和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這幾位先生一樣，錢先生可以而且應該被稱為「儒家」，我是非常同意劉先生的說法的。並且，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余先生本人也無疑是一位當代足以真正充分體現儒學基本價值的儒家人物的表率。不過，余先生辨錢先生與新儒家一文的用意，並不在此，而是另有針對。如今，事實越來越證明，余先生對於「新儒家」一詞的警惕，絕不是多慮和多餘的。

二〇〇三年，我的《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由臺灣學生書局初版時，劉先生為此書撰寫了一篇序文。其中，他不僅在開頭即許我為「忘年之交」，更說：「當今之世對於宋明理學解人已經不多，很難得的，國翔和我卻可以連篇累牘討論相關的問題，見面時更是講個沒完沒了，十分投緣。」雖然我這本書的確可以說是中國大陸研究陽明後學的領先之作，但劉先生序文最後所謂「為將來的學術開出新的機運，實在是大可振奮之事」，我覺得除了是他對我的鼓勵之外，更加充分顯示的，是他作為一位前輩，看到後輩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稍有進步，即油然而生的喜悅之情。

《良知學的展開》在臺灣出版時，我正在夏威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要講授兩門研究生的課程。由於劉先生在美國有長達十幾年的從教經驗，對於向美國學生講

授中國哲學所遇到的一些問題，我自然向他請教。那時電子郵件雖然已經使用，但劉先生還是用寫信的方式與我相往還。他給我的信件，我至今都有保存。比如，當年(2004)是劉先生七十大壽，臺港的幾位朋友籌劃出版給劉先生的壽慶文集，由學生書局出版。我接到邀約後，立刻寄去了我的祝壽文章。劉先生很高興，回信說：「你離得最遠，但是文章最先到。」此時此刻翻出來十幾年前的信劄，看到他的筆跡，唏噓不已。

劉先生和我的通信，一直不斷。但後來我常有訪臺的機會，與他的交流，更有當面暢談的方便。如今追憶我們見面的次數，竟然數不過來了。不過，二〇〇〇年以後與劉先生見面雖多，但大部分是在臺灣和香港。在大陸的見面，想來只有三次。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應該是二〇一〇年十到十一月間，劉先生應邀到清華參加朱子學會議以及到北大擔任蔡元培、湯用彤講座的那一次。那時劉先生看上去還硬朗，他也告訴我飯後堅持走路。在那期間，我請尚在清華讀研究生的李卓陪他到鳥巢和水立方遊覽了一下。記得當時我不免擔心他走路多了會身體不適，詢問李卓得知沒有大礙時，我著實感到高興。

劉先生來大陸的次數並不多，而且凡來定是參加純粹的學術活動。這與二〇〇〇年後，那些熱衷於在大陸各種場合尤其社會活動中頻繁出現的海外人士頗為不同。在我看來，這一點正是劉先生在立身處世的原則性上毫不含糊的地方。二〇〇〇年以來，由於市場經濟的不規範，大陸成為淘金的熱土；另一方面，隨著國學熱的遍及社會大眾，大陸也成為那些喜歡在社會大眾的掌聲中獲得存在感與滿足感的人士樂於前來的地方。這一點，顯而易見。以劉先生的聲望，來自大陸的各種邀約一定不可勝數。但劉先生能夠不為所動，嚴格將其前來參加的活動限於純粹學術的領域，足以顯出其超卓不俗的操守。同時，在臺北，他即使在腿腳行動不便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幾乎每天乘公共汽車到研究室中讀書思考、筆耕不輟。記得有一次他曾對我說：「我現在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一表面看似戲言的背後，反映的卻正是劉先生對於學術崗位的堅守。這種甘於寂寞的學術信守，與那些終日在社會上熱鬧場中俯仰周旋的身影相較，高下清濁可以立見。

當然，劉先生來大陸的次數少，並不意味著他對大陸不關心。恰恰相反。二〇〇四年，陳來先生在北京大學成立儒學研究中心時，劉先生曾經專門發去賀信，指出北大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同時也是開啟現代新儒學的所在，所謂「北大的教師不只有胡適、傅斯年，也有梁漱溟、熊十力」。另外，劉先生還以自己的收

入在武漢大學建立了獎學金，激勵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從事中國哲學的研究。諸如此類，都是他心繫大陸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表現。

在臺北與劉先生的最後一次見面，仍然是在他文哲所的研究室裏。那一次我專程去看他，告訴他自己已經決定來浙江大學工作。他知道我一直專心學術，不太措意現實物質上的事情，因而一直沒有妥善解決住房問題。當得知我終於能有自己的住宅，不用長期賃屋而居，可以使家人免受居無定所之苦時，他格外高興，臉上現出的笑容，我至今記憶猶新。並且，當我告辭而他執意要送我到電梯口時，他最後對我說的是：「房子的問題一定要解決，要照顧好家人。」這句話，我同樣言猶在耳。

電子郵件比較普及之後，我和劉先生通信就都改用電郵了。大概因為英文打字比較快，我和他的通信，也都是用英文進行。劉先生每次的回信都很及時，我想，這一定和他經常坐在電腦前工作有關。二〇一四年，劉先生壽屆八十，他在港臺的弟子們準備再邀海內外劉先生的門生故舊，出一本祝壽文集，只不過這次事先不告訴他，打算屆時給他一個驚喜。當主持此事的鄭宗義教授告訴我這一打算時，我十分贊同。劉先生晚年關注的一個領域是全球倫理和宗教對話，恰好也是我一直感興趣的課題。二〇〇一年他在立緒出版的《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曾經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因此，我就把與這一課題相關的一篇英文文章寄給了宗義兄。後來祝壽文集出版，劉先生果然十分高興。在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下午四點十二分給我的郵件中，他這樣寫道：

Dear Guoxiang,

Recently I am all right. I am grateful so many scholars contributed to the volume that celebrates my eightieth birthday. It is appropriate that your article in English, the last one in the volume, shows that my effort to present insight and wisdom of Chinese, especially Confucian, philosophy is not ignored in the English circle.

With best regards,

Shu-hsien

認為我以英文探討相關的課題，恰當地顯示了他在英文世界弘揚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的努力。

我最近一次和他的通信，是今年春節之後不久的二月十日。由於我寫牟宗三先生政治與社會思想的書，當時確定在三月由聯經出版，我就特別在信中告訴他這一

消息。我說可以請出版社寄他一本，或者等我六月赴會臺北去看他時，當面送他一本。而他在二月十五日十一點五十五分給我的回信是這樣的：

Dear Guoxiang,

I return to my office after the New Year holidays. Welcome the good news. You may bring the new book to me in June.

Best wishes for you in Year of the Monkey.

Shu-hsien

由於六月的會議是否能夠成行並不能保證，我的書出版之後，還是請出版社先寄了一本給他。我想這樣見面時或許更可以就其中的內容向他請教。可是，出版社在三月底四月初左右寄出之後，我一直沒有收到劉先生的消息。以我對他的認識，我想他收到後一定會給我來封郵件的。因此，沒有劉先生的消息，我心中不免擔心，猜想他多半是身體方面出了問題，以致無法坐在電腦前工作了。不過，我雖然猜到劉先生的健康出了狀況，但認為他經過治療和休養，過些時日定會康復，重新過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生活，絕未料到他這次的沒有音訊，竟然是駕鶴西去、與世長辭了。

六月七日的赴會歐洲，讓我無法及時對劉先生的辭世寫下我的感懷。但是，這幾日的時間，卻也使我得以較為仔細地回想我與劉先生二十年多年的交往。點點滴滴的細節雖然不能一一記憶，但種種與劉先生促膝長談的情景，尤其是他的音容笑貌，卻一再清晰無比地浮上腦海。每當此時，心情都久久難以平靜。二十一世紀以來，華人世界中真正堪當「儒家」且學貫中西的人物，原本已然無多。劉先生的逝世，可以說是璀璨而寂寥的群星中又一顆的隕落。思之怎能不感慨萬千？眼下，劉先生公祭之日在即，我匆匆寫下這篇文章，作為我對這位當之無愧的現代儒家人物以及我個人忘年之交的前輩的紀念。

2016年6月13日草擬於 Vilnius 返程途中

2016年6月16日完成於武林之紫金港

2016年7月7日再次修訂於 Washington, D.C.

（本文初稿刊載於《鵝湖》第493期〔2016年7月〕，惟本文內容作者已另做增補，與初稿略有不同。）